

前 言

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着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階級斗争是錯綜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階級和階級斗争的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长期的战略任务。

《階級仇恨記心間》收集了十二个老工人的家史，是一部分階級和階級斗争教育的活教材。这些家史都是用血泪写成的，是旧中国階級剝削和階級压迫的血淋淋的写照。

这几篇血泪史記录了老一辈工人在旧社会的种种悲惨遭遇：被压榨、被奴役，失业貧困、饥寒交迫，被毒打、被枪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等。从这里，我們可以具体地看到地主、資本家的凶恶、狠毒的本性；也可以具体地看到在剝削制度下生活过来的老一辈工人曾經遭受了多么残酷的剝削和压迫，經歷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和困苦！

本书的作者都是受苦深、觉悟高、劳动好的老工人。他们回忆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对比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有情有节，真人真事，亲切感人。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认识旧中国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认识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从而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仇恨旧社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和毛主席，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統一書號：3116·112
定 价：二角四分

目 录

理发工人話今昔·····昆明市云裳理发室理发师	姜朝林	1
一个女工的控訴·····一平浪盐矿女工	万福秀	10
三条人命·····昆明钢铁公司工人	张正富	21
我家的血泪仇·····昆明冶炼厂工人	周 标	28
五十年的遭遇·····昆明铁路局安宁工务段工人	刘长忠	42
阶级仇恨記心間·····明良煤矿新平坑	崔应学	50
断手以后·····昆明铁路局开远折返段工人	赵 森	60
父亲的死·····昆明机床厂工人	刘金顺	65
到处受折磨·····以礼河安装工程队工人	閻錫威	77
徒工的血泪·····昆明机床厂車間副主任	汪向葵	83
从流浪儿到工程师·····云南印染厂彝族工人工程师	戴仁理	90
忆苦更知今日甜·····昆明机床厂工人	赵学全	99

理发工人話今昔

昆明市云裳理发室理发师 姜朝林

我今年四十三岁，干理发这个行业已經有三十个年头。提起“侍候人”是不是“低人一等”，使我想起了在旧社会十六年的辛酸日子。

三年徒 三年奴

我是建水县人，父母死得早，六七岁就給地主当牛馬。后来，地主把我卖到箇旧矿山上当小“砂丁”，干了一年，我受不了資本家的折磨，就逃跑到箇旧城里。十三岁那年，为了找个糊口的地方，我向一家理发店老板一次又一次地恳求，他才收留我当个学徒。

那时候收学徒兴办三件事：請鋪保、写师約、賭咒，好不容易！投师約上写的是：“学三年，帮三年；病一天，补一天。损坏工具，日后照赔。天灾人祸师不管，逃跑照算飯食錢。”这哪里是投师約，真是道道地地的卖身契！晚

上，老板叫我对祖师爷牌位跪下赌咒：“师徒如父子，依师如父母……”他用这套封建迷信办法迷糊我，叫我死心塌地给他当牛马。

“师徒如父子”，没得那么好的事。在旧社会我们常说“三年徒，三年奴”，这是实实在在的。我每天给他家端屎倒尿，烧火煮饭，洗碗扫地，从早苦到晚，还经常挨打。一天两顿饭，我要站在一旁侍候，给老板拿碗添饭，端菜递汤，直到众人都吃归一了，我才得拿筷子，吃桌上残汤剩饭。晚上老板抽大烟，我要给他端茶、买宵夜，到了三更半夜，才得躺倒休息，才睡一小下，天又亮了。

两年过去了，我还没有摸过刀子，老板只是教我练“手功”。晚上，他老两口躺在床上抽大烟，我站在他们床前，双手半举，肘上放一碗水，右手手腕不停地摇动，每天晚上要练三柱香那么久，整得我脚又酸，手又麻，眼泪淌下来都不敢去揩一下，怕挨打。有一天晚上，太累了，站到第三柱香，瞌睡就来了，一不留神肘上的一碗水掉在地上，碗也打烂了。老板勃然大怒，从床上跳下来，一手抓着我的头发，一手朝我身上乱打；打够了，又拿起香火烙我的眼皮。我眼皮上的一块伤疤，到现在二十多年了，还长不出眉毛。

在旧社会，要想从老板那里学点技术，比上尖刀山还难！开初只叫我给小娃娃剃头，不告诉我怎样起刀，怎样

收刀，可是动作有点差错，不是扭耳朵就是擰眼皮。有一次，不小心給一个小娃剃出一小点血，老板把我拖到房間里，又打又罵，跪在地上不准起来。为了学点技术，每天晚上，我悄悄地拿出剃刀，在自己的膝盖上刮。更深夜靜，正是睡眠的好时光，我一个人还在小油灯下，在自己的膝盖上来回地刮呀刮。日子久了，膝盖都刮出老茧。我当了三年徒弟，挨了无数次的打罵，才学会了給小娃娃剃个“馬桶盖”，連鬍子都刮不干净！

学了三年还得帮三年。老板叫我跟师兄挑担串街，每天要交一元五角錢才給我們吃飯。这种痛苦生活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跑到蒙自。

生活如花子

蒙自一家理发店收留了我。老板說我鬍子都不会刮，技术太差，做得一元分給我两角，格外还要我“参师”。“参师”就是要經常向老板送礼，实际上就是一种剝削。我分得几文血汗錢，扣掉伙食，經常买点大烟、点心及其他东西送老板，月月手中都剩不了几文。我在蒙自干了四年，只掙得一把剪刀和几把剃刀。我的全部家当只是几件烂衣衫、一床破毡子。后来听說在昆明帮人理发工資高，我就約了一个同伴，到开远买了火車票，抱着天大的希望来到昆明。誰知在昆明比在州县上还苦，表面上工資比較

高，可是資本家的剝削花样百出，到头来，还是天天辛辛苦苦，年年缺衣少食。那时候在昆明流行着三句挖苦理发工人的話：“出門像公子，工作像孝子，睡覺像花子。”这三句話，概括了当时我們理发工人的痛苦生活。

我到昆明后，卖掉刀剪和一些值錢的衣物，买了礼物送給当时理发业大把头王有山，他才把我介紹到紅星理发店工作。在紅星理发店苦了三年，才掙得一套进入启华理发室的工作服。当时江浙老板开的理发店表面上工資比較多，但是陈規旧律很多，剝削手段特別毒辣。理发工人給資本家当奴隶，不但要訂卖身合同，而且要自备皮鞋、毛呢褲子、白衬衣，白衬衣左边口袋还要插上一条手絹。沒有这套“公子衣服”是不准上班的。

提起“出門像公子”，我們老一輩的理发工人都不由得心酸落泪。一套工作服，要忍饥挨冻几年，流了多少血汗才換得来！我們“出門像公子”，并不是我們生活富裕，我們是被迫給資本家装璜門面，招徠顧客。其实，我們生活都十分貧困，往往外表像“公子”，內里像花子，衬衣的衣領和前胸是白洋布，衬衣后背以及汗衣汗褲都是烂的。有时候，买一件衬衣，就将后背剪下来做衣領或手絹。这种苦楚，就像哑子吃黄連，有苦不能說。

那时也沒有什么“宿舍”，只好睡在地上。工人买不起被子，都是租被子来盖，一个月一块多錢。我是到結婚

那年才买了一床旧棉絮，总算盖上自己的被子。我们从早站到晚，脚站得肿起大碗口粗，手又酸又麻，下班后，累得要死，大家横七竖八躺在地下，就像睡在街头的叫花子。

工資到哪里去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剝削光了。我在过几个大理发店，明說三七分賬，可是资本家总是挖空心思，用各种手段把你的三成也剝削掉。比如拉你抽大烟、强迫你和他賭博，每逢老板、老板娘、和他們的儿女的生日，要你送礼，每逢除夕，老板家多少娃娃要你送“压岁錢”。最毒辣的是强迫你上賽，或者工資拖延不发，老板把錢拿去做投机生意，結果本来可以买几十斤米的工資，后来只买得几斤米。此外，黄色工会收会費、壮丁費、棺材費……；国民党反动派要收所得稅、戶口稅、保甲捐……。不管你一个月三七分賬分得多少錢，七除八扣，交捐上稅，到头来还是缺穿少吃，儿女啼饥哭寒。1948年我在云裳理发店，老婆帮人做針綫，家中只有一个孩子，可是一家三个人飽一頓餓一頓，穿得破破烂烂的。

失 业 的 痛 苦

我們端的是资本家的碗，天天提心吊胆，生怕被开除。在旧社会，资本家叫你上午走，你不敢留到下午。解放前我在昆明，被资本家赶走了二十多次，尝够了失业的痛苦。长点干到三、四年，短点只干了几天，资本家就把

我赶走。有一回，我在晓东街一家理发店，刚干了三天，有一把好剃刀被人偷了，我大着胆子问资本家一声，他把脸一沉，骂我：“放你的狗屁！”怒冲冲拿起笔就在牌子上把我的名字划了一个圈。我又被开除了。

我在启华理发店给老板当了三年多牛马，可是当我害病时，老板反脸不认人，把脸拉得长长的对我说：“我这里不是医院”，把我开革了。我在昆明无亲无故，只好到东寺街一家鸡毛小店住下，自己熬药，自己煮饭，孤苦伶仃的。这次病了一个多月，把皮鞋、毛呢裤子全套“公子衣服”都卖光了。病刚好，我就拖着瘦弱的身子到启华理发店要求上班，不料老板冷冷地回我一句：“人满了，到别家去看看。”就把我推出门。我走出店门，想到身边没有一个钱，衣食没得着落，眼睛涌满了泪水。

在旧社会，许多理发工人都经历过失业的悲惨遭遇。我认得一个理发师，下江人，技术非常好，因为给资本家送礼送少了被开除。失业后，他把值钱的衣物都卖光了，最后流落街头当叫花子，晚上常常歇在当时“青年会”的墙脚下。每年一过阴历十二月，理发涨价了，资本家才拉他进来，给他穿上皮鞋和西装，迫他从早到晚拚命干活。资本家一直叫他干到除夕晚上，然后又把他的西装和皮鞋脱下来，一脚把他踢出店门。正当万家灯火，资本家在花天酒地过年的深夜，他又在街头流浪。现在想起这种叫花

子生活就心酸。

处处受侮辱

在旧社会，理发工人被人罵为“下九流”、“刮刮匠”，誰都瞧不起，被打被罵更是常事。連我自己的外公外婆知道我在昆明干理发，也不好意思承认我是他們的外孙。我們說亲时都不敢实說自己是干理发的，怕人家另眼看待。那时誰家願意把姑娘嫁給理发工人！

理发工人不但受資本家的气，还得挨国民党反动軍警、反动官僚以及地痞流氓的打罵。我們虽然陪着笑脸，口称“老爷”，工作得像“孝子”，可是一不留神，往往要挨耳光甚至被打得半死。我在启华理发店时，有一天，国民党偵緝队长周伯軒带着卫兵大搖大摆走进来，就在我的椅子坐下。这个家伙把脚跷得高高的，头死死地粘在靠背上，像猪一样吹着鼻音。每次扶他的头，我都是心惊胆战，生怕惹祸。快要刮鬍子时，一时慌乱，我錯拿了鬍子油，一擦在鬍子上，他突然睁开眼睛，罵声：“干什么！瞎了眼睛！”就打了我两个耳光，接着又是一脚，把我踢出二三尺远。老板連忙給这个大特务賠不是。我爬起来对老板說：“算了，請別人給他理吧。”这个混蛋竟大吼道：“偏要你給我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吞下眼泪，又小小心心地給他刮鬍子。我在大美理发店时，一个同事叫蓝应成，有

一次給一个反动軍官理发。理完后，这个反动軍官摸摸鬍子，破口大罵：“媽的，怎么不給我刮干净？”就揮拳打蓝应成两个耳光。我們都十分气忿，蓝应成也很生气，就回答他說：“刮不干净再刮嘛，为什么动手打人？”这个反动軍官頓时十分恼怒，对两个卫兵大喊：“揍死这个下流貨！”两个卫兵用枪托把蓝应成打得遍身青肿，口中淌血。那时候刀把子在人家手上，我們虽然十分憤恨，却无法救救他。蓝应成回家后，拖了三个多月就死了，家里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在旧社会，这种冤枉事經常会碰到，可是有冤无处訴，碰着就算你倒霉。

今日理发师 人人受尊敬

解放后，工人当家做主人，我們理发工人彻底摆脱了資本家的残酷剝削，生活得到根本的改善，并且一天比一天好，永远結束了“生活如花子”的苦日子。在旧社会，我們夫妇两个人干活还养不起一个孩子，現在我們两个人工作，一家五口人，孩子上学，要吃有吃要穿有穿的。在旧社会生病就失业，就要当卖衣物，前年我害一次重病，領導和同志們都来看我，还把我送进医院。出院后，又把我送到白魚口工人疗养院休养，在医病和休养期間，工資送到我家中。旧社会和新社会，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新社会也永远結束了我們被侮辱被歧視的命运。我們

理发工人成为光荣的服务人员，受到人们的尊敬。经过党长期的培养教育，我于1959年入了党。有一次省委开三级干部会议，调我去理发，首长们个个笑嘻嘻地喊我老姜同志，亲热地和我握手，真使我笑在眉头喜在心间。现在顾客称我们为理发师，工作做得好一点还受到表扬。有的人现在还说什么理发是“侍候人的工作”，“低人一等”。在新社会说这种话那就错了。我们现在侍候的不是“老爷”、“太太”，而是劳动人民。再说，别人也同样侍候我们，为我们服务。比如京剧演员来理发吧，是我“侍候他”，他坐着我站着。晚上我看他演戏，我坐着，他演着、唱着。你能说谁侍候谁，谁“低人一等”呢？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分工不同，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样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光荣的。我十分热爱我的工作，我感到十分光荣。我决心好好干一辈子，带好接班人，这样才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楊 树 整 理

一个女工的控訴

一平浪盐矿女工 万福秀

万恶的旧社会，害得我从小失去双亲。我的家乡在哪里，父母姓名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只认得我的小名叫秀兰。反动派把我当做商品輾轉販賣七次，多亏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来，才得到了翻身。

自幼失去亲爹娘

我三岁那年，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兵、拉夫，父亲为了躲兵，在外面东奔西逃，不敢归家。一天晚上，父亲偷偷地回来看望我們母女，不料被伪乡公所的爪牙看見，这些家伙就闖进我家，把我父亲五花大綁捆走。媽媽急得嚎啕大哭，我从梦中惊醒，吓得也哇哇地哭起来。从此，我失去了亲爱的爹爹。

父亲被抓走后，媽媽整天伤心啼哭，一双眼睛哭成了“烂桃子”，眼泪都流干了。狠心的恶霸趁火打劫，欺我

們孤儿寡母，霸占了我家的田地和房屋，把我們赶出家门。我和媽媽无家可归，只得搬到山洞里住，白天割点草打草鞋卖，挖点野菜充饥。后来实在活不下去了，母女俩就沿途讨飯，一直流浪到昆明。昆明虽有許多高楼大厦，但是却沒有我們穷人安身的地方。好容易找到一家馬店，媽媽苦苦哀求，老板才勉强讓我們住下来。

媽媽自小学得一手好針綫。她每天一早就出門帮人家做針綫活，換得几口飯，两个人勻着吃。晚上她又忙着赶回店里帮老板干活，抵房租費，直到半夜才得休息。那时，媽媽一有空就四处打听爹爹的下落，盼望爹爹能早点回来，一家团圓。可是在旧社会，穷苦人家只有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爹爹生死不知，哪里去找？

那几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常来轰炸昆明，三天两头跑警报。有一天，我媽一早就出去帮人了，突然响起警报，大街小巷，个个沒命地奔跑，四处有人在呼爹唤儿。我惊慌得不知往那里跑好，只会沿街大声哭着喊媽媽。这时候，老板的大儿子跑过来拉着我說：“小姑娘，別害怕，叔叔領你跑吧。”他拉着我跑到一个僻靜的地方躲起，只听见一陣嗡嗡的飞机声，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警报解除后，他把我騙走了。从此，我再也沒有见过媽媽的面，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那时，我只不过八岁。

女老板家当女奴

这个坏蛋是个“人贩子”，第二天，他就把我卖给一个做咸菜生意的女老板。开初几天，不论白天黑夜，一想起妈妈我就啼哭，女老板一见我哭就拿棍子朝我身上乱打。后来，在人前我也不敢哭了，只是背着人时，才敢偷偷地流泪。这个女老板为人十分凶狠刻薄，我才是个八、九岁的孩子，不但要我给她家挑水、扫地，做许多家务事，还逼我每天洗四、五背篋的菜。洗菜这个活路在春夏两季还好，一到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手脚泡在冷水里，冻成紫黑色，还会淌血水。菜洗完了还得背回去，菜水往背脊上淌，冷得如钢针扎背，痛苦难熬。冬天这个女老板总是整天在家烤火，盘算怎样剥削店里的工人。可是我冷得周身发抖，手脚都麻木了，不要说到灶房里烤一小下火，就是站着休息一下都不许可。我拚死拚活地干，也没有得到这个女老板的欢心。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烂了一个腌菜罐，她气得简直要发疯，拿着粗粗的棍子，就向我身上没头没脑地毒打，还骂我是“不中用的废货”。后来她就把我转卖给马市口一家姓孙的官僚。

血染孙家破花缸

孙家有权有势，专靠刮削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的

无耻生活。他家有兩個花園，培植花草的長工有五個，還養着兩隻大狼犬。

在孫家，從早到晚倒馬桶、挑水、掃花園過道、澆花、洗衣服，什麼苦活、髒活都得干，吃的是他家的殘湯剩水，還要挨“老爺”、“太太”以及狗腿子的毒打。真是受苦的人災難多，有一天中午，我在花園里洗衣服，一個小偷從後門鑽進來，把洗衣盆偷走了。我真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孫老婆子喊我跪下，氣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大聲罵道：“小爛屎，你把老娘的銚盆拿到哪里去了？”我吓得不敢抬頭，輕輕地回答：“老太太，盆子是小偷偷掉的。”她從凳子上跳起來，指着我的臉大罵：“把你賣掉也抵不得我的盆子錢！”她拿起鞭子，就沒命地向我身上抽打。她把我打得頭上、腳上血淋淋的還不甘心，又喊一個狗腿子將我吊在屋梁上。沒有吊上多久，我就昏死過去。當我蘇醒時，我躺在他家的狗窩里，周身像火燒一樣痛，我一翻身，才發現我的左手动不得，原來被吊脫了。第二天，他家還逼我掃地、澆花。因為左手不聽使喚，把花盆打爛了。他家的狗腿子看見了，一把抓住我的頭髮，按着我的頭撞破花瓶，鮮血染紅了破花瓶，他還不放手，直把我撞昏倒，還狠狠地朝我的腰杆踢了兩腳。從此以後，每逢天陰下雨，就遍身發痛。

孫家逼我像牛馬一樣干活，可是飯又不讓我吃飽。我

多吃一碗，就把我的碗搶掉，还罵我是“餓鬼”。我經常餓得頭昏眼花，四肢無力，有時坐在太陽底下洗衣服，只覺得天旋地轉，連手上的衣服都看不清楚。窮人的苦，只有窮人認得。那時只有幫孫家的一個長工老爺爺心疼我，看見餓得可憐，常常背着主人拿點東西給我吃。

在孫家，我作夢也在思念媽媽。心想，只有找到媽媽，我才有跳出這火坑的希望。可是一年又一年，却始終找不到媽媽的下落。

我在孫家被折磨了三四年，有一天，這位惡毒的“孫太太”把我喚到跟前，狡猾地對我說：“秀蘭，你這兩年犯了‘八敗’，現在將你送到我的親戚家去避避邪，明天就去，要好好聽人家的話。”就這樣，她把我賣給高曉的一個商人。

繼續賣給李拔貢

這個商人的兒子是個流氓，經常賭錢，輸打贏要。我到他家沒有多久，這個流氓就被抓去關起來，後來花了一些錢才放出來。他家又胡說什麼我“犯八敗”，沖得他家事不順，把我二次賣給孫家。我在孫家又被折磨了一年，然後，他們又把我賣給安寧的惡霸地主李拔貢家。臨走那天，他們把我捆起，拋上汽車，又綁在汽車上怕我逃走。

李拔貢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太惡霸，兩個兒子在國民黨



反动军队当官，有钱有势，年年都有好几个了头遭他的毒手，不是被强奸后卖掉，就是被折磨死。

到李家后，每天上山背柴、背炭，格外还得侍候他家的“小公子”。这个小家伙和大人一样坏，他欺我是个了头，穿得破烂，时常无故拿棍子打我的头玩，我也只好忍气吞声。有一次，他爬树玩，不小心跌下来，就哭着去告

他老爹李拔貢，硬說是我把他攆倒了。当时李拔貢正在用刀削烟杆，二话不說，順手朝我的脖子砍了一刀，鮮血即時順着背脊淌，我顧不得疼痛，赶忙捂着傷口跑开。几天后，我的傷口就潰爛生蛆了。交租的农民問我，“你的脖子咋个了？”李拔貢的老婆还說我是生“砍头疮”。

一年后，李拔貢的“小公子”病死了，我心中暗暗高兴，总算少了一个祸害。那知道李家說我“犯八敗”，是我把“小公子”冲死的，对我恨入骨髓，存心要把我活活折磨死。每天从早到晚，逼我来回到山上背柴、背炭，两頓从猪食桶舀些給我吃。晚上两只老豺狗躺在床上抽大烟，还要我給他們捶脚，捶慢点就用烟釘子戳我的臉。这两只沒有人性的豺狼，什么狠心的事都干得出来。有一天，李拔貢的老婆借口我沒有把她的尿盆洗干净，一边乱罵，一边順手抓起一根木棍对我乱打，把我的当門牙打断了一个，至今这顆牙齿还是半截。有一次，李拔貢叫我出外买大烟，不巧在回来的半路上遇着暴雨，河水猛涨。过河时，河水齐胸口，盒子里的大烟晃泼了一些，剩下的被雨水淋湿了。李拔貢看了带水的大烟，勃然大怒，抓着我的头发毒打。打够了，拖到門口，一脚把我踢到門外的石坎子下，我馬上昏死过去。我苏醒后，才发现一只脚攆伤了，只好爬到隔壁一位穷老大媽家，央求她收留我，帮我医医脚。老大媽点点头說：“孩子，就住下吧，穷人的命苦

呀！”她也流下辛酸的眼泪。

老大媽把我当亲人，天天找些草药給我包脚，她吃什麼就給我点吃，我的脚也慢慢好起来了。有一天，我对她老人家說：“大媽，我能走路了，我想到昆明找媽媽。”提起苦命的媽媽，我眼中就涌出泪水。老大媽亲切地說：“要去就快点走吧，不走李家也会把你娶回去。”接着她关心地問：“你路上怎么办？”我哽咽地說：“沒有办法，只好沿路討口了。”她叹了一口气，什麼話都不說了。

我逃跑到羊老哨，李拔貢果然派人追来，把我捉回去。这次李拔貢用最毒辣的手段折磨我。他把我关进畜厩里，再点燃两把稻草丢进去，我在里面被烧得呼爹喚娘，头发都烧光了，遍身烧起无数水泡。晚上我躺在狗窝里，奄奄一息，只剩一口气了。

这种苦日子哪天能熬到头！李拔貢既然存心把我活活折磨死，眼前只有一条生路：逃走。有一天，一个小伴悄悄地告訴我：“李老爷要把你卖了，現在正給你找主呢。”这个老恶霸还想从我身上捞一把！我想，叫这些地主老財卖来卖去，不如自己逃生，我就拿定主意再逃跑。

逃出虎口进狼窝

一天清早，我借口上山背柴，爬到山上，把皮条背板丢下，就从山后逃走。往哪里逃呢？朝东跑昆明，又会被

李拔貢追着。我把心一橫，丟掉找媽媽的念頭，拚命往西跑。這次我逃到一平浪。誰知逃出虎口，又闖進狼窩。一平浪的惡霸劉壽培欺我是個無家可歸的姑娘，逼我到他家當了頭。人地生疏，無依無靠，我也只好暫時順從。不久，李拔貢派人到劉家要拉我回去，我死活也不肯再回李家。劉壽培看我干活勤快，也想把我留下，就用五十塊錢把我買下來。

天下烏鴉一般黑，劉壽培的心腸和李拔貢一樣狠毒。在劉家整天做不完的牛馬活，三天兩頭挨打，吃的是他家的殘湯剩菜，晚上睡在灶房地上，不如一條狗！我忍受不了這種牛馬生活，就逃到干海資討飯。劉壽培派人又把我拉回一平浪。我暗暗着急，回去命是保不住了。可是我又想，大不了一死，苦日子也過夠了，我才不想活呢，就大着胆子回去。想不到劉壽培見我回來，偽裝笑臉，既不打我，也不罵我，還叫人端白米飯給我吃。原來這個惡霸已定下了陰謀詭計。

這時，解放大軍已逼近雲南，這些反動傢伙紛紛收集財物，尋找“後路”，企圖逃脫人民的懲罰。這個惡霸就在我身上打主意。有一天，他對我說：“現在世道很亂，我們家要搬到昆明，現在暫且把你寄在劉成盈家，等我們安好家再來接你。”話說得滿和氣，當時我心里還暗暗高興，以為到了昆明就可以找到媽媽了。誰知道他把我送到

刘成盈家，就按着我的头和刘成盈拜堂成亲。后来我才知道，刘寿培把我卖给刘成盈一百五十块半开。这个反动家伙临死了还作恶，多么毒辣啊！

逃出苦海見青天

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刘成盈得到了工作，后来我也成了一名光荣的烘盐女工。老刘也是个受苦的人，我們相处得很好。現在我們有三个孩子，一家人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真是苦尽甜来。

在旧社会，我当过十年了头，被卖过七次，世上的百样苦，我尝过九十九样。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我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万分热爱新社会，常常感到为党为社会主义做的太少了，总想多做点工作。小组的同志经常照顾女同志做点輕活，我过意不去，总是拣点重活做。有的女同志嫌拉烘盐車的活計重，我就主动要求拉烘盐車。我常常想，在旧社会帮地主老财，什么髒活累活都得干，生活不如一条狗。現在生活这样好，工作是自己，为社会主义，劳动不主动积极，怎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呢？我在工作上稍微有点成績，党和同志們就給我鼓励，每次評奖，車間和小组都把我評在一、二等。每次得奖，我心里总是十分激动，同时也想到自己在工作上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

我是新中国的妇女，又是光荣的工人阶级 的一个成员，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大责任。我一定要努力学习，鼓足革命干劲，为党为社会主义更加积极地劳动。同时，我也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阶级斗争，提高革命警惕性，因为那些曾经折磨我们劳动人民的反动派是不会甘心于死亡的。

温显祺 整理

郎 森 插图

三 条 人 命

昆明鋼鐵公司工人 张正富

在我們煉鋼廠左邊，有一個小山頭名叫“西瓜地”，現在那里已經豎起煉鋼房，多少工人不分晝夜在這裡戰鬥着。在解放前，“西瓜地”是個荒蕪淒涼的亂墳地，許多被資本家奪去了生命的工人弟兄，都被丟在這裡。二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曾經三次上“西瓜地”，埋葬我那两个苦命的孩子和他們的母親。解放后，托毛主席的福，我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每当我經過这个埋葬三个亲人的地方，禁不住要回忆起这段悲慘的日子。

在旧社会，我帶着泥刀和泥鏟，到处流浪，一家人吃不上一頓好飯，穿不上一件好衣衫，生下八个孩子，就病死餓死了六个。1944年正月間，我进当时的中国电力制鋼廠当建筑工人，想过几天安穩日子。誰知給資本家当奴隶，比在外面打零工还要苦。監工是个凶狠毒辣的走狗，长得肥头大耳，一臉橫肉，当面我們叫他“叶先生”，背

地里都叫他“大头鱼”。在监工的皮鞭下，我们一天干十三四小时重活。此外，工人弟兄被折磨死了，厂里死了牛、马，资本家死了狗，都叫我们去埋。每个月得几块钱工资，东西天天涨价，买点米还不够我一个人糊口。孩子的妈天天到村子里卖工，九岁的老憨上山背柴，一家人还是吃上顿愁下顿，七岁的老二经常饿得哭哭啼啼的，这种穷日子好难混呀！

常言道：“绳子专由细处断”，在旧社会，灾祸专往穷人家里闹。三月间，九岁的老憨害了烧热病，隔两天，七岁的老二又病倒了。两个娃娃浑身烧得烫手，昏昏迷迷的。想起这半辈子生了八个孩子只留下这两个，万一有个好歹，如何是好！我和娃娃家妈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厂里的医生是不给工人看病的，家里一文钱都没得，这怎么办呢？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去找“大头鱼”，对他恳求道：

“叶先生，我家两个娃娃都害重病，请厂里借给我几块钱抓药……”“大头鱼”不耐烦地抢着说：“才来三个月，就想借钱，还早哩！”天哪，娃娃都要死了，还分进厂早迟。我连忙说：“叶先生，娃娃病老是重，请你家帮帮忙。”最后，“大头鱼”才说：“我给你问问王主任，莫罗嗦了。”三天后，娃娃病越发重了，我又去找“大头鱼”。他一见面就恶声恶气地说：“王主任说，工厂又不是财神菩萨，你自己想办法！”

“要是自己能想到办法，我也不来麻烦你家了。娃娃快要病死了。”我忍气吞声地央求。

“死不死我管不着。没有就是没有，有也不借……”他扭轉屁股就走开。

錢沒有借着，倒挨这畜生罵了一頓。我又急又气回到家里，进门一見床上的娃娃，又心痛起来。老大見我进来，睜开枯黄的眼皮，有气无力地喊“爸爸”，我的眼泪一下子簌簌地淌下来。我揩揩眼泪，狠了心，把两床旧被子拿出来卖了。我和他媽，一个人背一个到馬街子瞧病，抓了两服药。吃了药后，不見效果。过两天，我們又卖掉几件旧衣衫，把两个孩子又背到安宁，抓了一服药。吃了这服药，两个孩子的病有点起色。可是，我們已經没有什么值錢的东西可以卖的了。

晚上，我們正在着急，“大头魚”派人来，喊我馬上去。我想，或許資本家发了善心，借几文給我，娃娃就有救了。我急急忙忙跑到办公室，不料“大头魚”根本不提借錢的事，他指着地上的一个木盒盒对我說：“把这个拿到王主任公館！”我着急了，便大着胆子又苦苦哀求道：“叶先生，請你家做个好事，少借几角錢給我抓服药也行。”他瞪起双眼，大声罵道：“不識好歹的东西，你罗嗦些什么，可是你不想活了！”我又气又恨，拿起木盒盒，憤憤地走了。到了王公館，才知道是要我埋他家的死狗。我好不容易压

下心头怒火，耐着性子收装了死狗，把狗棺材扛到“西瓜地”埋掉。

夜深了，眼前黑茫茫的，四处静悄悄的，这埋葬穷人和死狗的“西瓜地”好凄凉！莫非我家的……。我不敢再想下去。我的心突突地跳，三步并成两步走回家。

回到家门口，我赶快走到床前，老二昏迷不醒，老大呆呆地望着我。在惨淡的油灯下，只见他脸嘴黄得像蜡一样，没得一点血色，一双小手只剩皮包骨，像根枯树枝，喉中的口痰呼噜呼噜地响，小嘴一扇一扇的，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又说不出来。我摸摸他的脸，心里难过极了，轻声地说：“娃娃，只怪你爹穷，没得办法救救你！”眼眶里涌满了眼泪。已经三天米水不粘牙了，他妈递一碗饭给我，我心如刀绞，端过来扒两口，咽不下去，又递给他妈。只见老憨小眼睛白瞪瞪地翻了翻，我惊叫了一声：“他妈，不行了！”一把抱住老憨。他妈一惊，手中的饭碗落在地上撞得粉碎，接着“哇”哭了一声，昏倒在地上……。老憨死了。

第二天，我忍着心中的悲痛去找“大头鱼”。

“叶先生，我的大娃娃死了，请你家给几块烂板子，做个盒盒……”我低着头向他请求。

“娃娃死了找床草席子裹裹就算了嘛，何必要什么板子。”“大头鱼”不耐烦地回答。

我顿时火了，就大声说：“王主任的狗死了钉棺材，我的娃娃是人啊！”

他拍着桌子就骂起来：“他妈的，你这穷骨头，凭什么跟王主任比！”

我气得浑身发抖，真想动手打这个畜生。我气忿地顶着他說：“不要你的板子。我穷，穷得有志气！”说完我就返身回家，用草席子把老憨裹起来，抱到“西瓜地”埋了。

第二天，我們最后的一个娃娃老二，也咽了气。我含着眼泪，又把苦命的老二抱到“西瓜地”埋了。

我們生下八个娃娃，现在都死完了。这半个月，我老婆急伤了，不知晕倒了多少次。老二死后的第三天，她又晕倒在地上，我上班去了，还是隔壁的大嫂把她救活过来。从此，她得了“血奔心”的重病，就卧床不起，天天伤心流泪，飯也不吃，拉的尽是血。我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沒得一文錢抓药，只得等下班后到山上挖些草根熬给她吃。就这样，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晚上，她一边呻吟，一边伤心地对我說：“他爹，我在不了几日啦。娃娃都去了，我也不想在啦！”我一面揩眼泪，一面安慰她：“她媽，好好休养，莫胡思乱想，我拚命也要想办法抓几服药。”

为了救救老婆的命，我跑遍了左邻右舍，可是家家都沒有下鍋米，那点有錢借給我。唯一的希望是再找资本家想办法。我想，人都是娘生父母养的，多少总还有点良

心，难道这些畜生沒得一点人性。我抱着希望又去找“大头魚”。想不到我前脚刚走进門，这畜生就幸灾乐祸地說：“哈哈，又是来借錢。”我咬咬牙，把眼泪往肚里吞，又一次低声央求道：“叶先生，請你发个善心吧，他媽病老是重了。”他厌恶地說道：“你有志气，怎么又来借錢了。”停一下，他竟罵起我来：“看你这副穷样子，……不仔細想想，你是什么人养的，死了算什么……”

这一罵，把我气得眼睛冒着金星，耳朵嗡嗡叫，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指着他的脸罵道：“你媽的，不借算球，怎么出口伤人！”“大头魚”勃然大怒，举起一条长凳子就想打我。当时旁边的許多工人都跑过来护着我，个个憤怒地瞅着这个凶恶的监工，我也大声地叫罵：“媽的，你敢打下来，老子把你的脑袋扭了！”这个家伙看見人多势众，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軟了下来，挟着尾巴走开，可是口中还是恨声不絕地說：“要造反了，要……。”有的弟兄劝我說：“跟这个畜生讲什么道理，将来再跟他算总賬。”有的弟兄安慰我說：“忍着点吧，先回去照顾大嫂要紧。”大家你三角，我五角，凑了五块钱給我，这时我对大家的帮忙又是难过，又是感激。在旧社会，只有穷人才心痛穷人！

我拿着錢赶快到安宁去抓药。因为拖得太长，病拖重狠了，連吃了几服，病情沒有什么好轉。

有一天中午，我下了班，刚一进门，一股冷气迎面吹

来。我仔細一看，他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我奔上去叫了几声，沒有答应。她死了。

我沒有再到厂里向資本家要木板，我知道他們不会同情我。我拆下床板，釘成一个盒盒把她装了。第二天，請几个穷弟兄帮忙，把我最后的一个亲人又抬到“西瓜地”埋了。

年初进資本家的鋼厂时，我好端端的一个家，大小四个人，热热闹闹的。不到半年，三个亲人都死了，只留下我一个孤人。我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可是資本家沒有借給我一文錢，沒有給我一块烂板板！

解放后，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我才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七个人，工作的工作，讀書的讀書，日子越过越甜。在旧社会，我虽然有一手技术，苦得腰酸背痛，还是天天挨冻受餓，穿得破破烂烂的，什么野菜我都吃过，娃娃病了沒得錢医，两个月死了三个亲人，弄得家破人亡。想起旧社会，我好痛恨！

昆明鋼鐵公司党委宣传部整理

我家的血泪仇

昆明冶炼厂工人 周 标

媽媽出門討飯去

爹爹借下閻王債

在后山，挨着我們厂不远的那个村子叫漁街子。从前，这个村子有一百二十多戶人家。村子的西头是大地主倪金司的高墙大院。从这大院向南望去，在十多棵挺拔的柏树下面有一間破茅草棚，那便是我們几輩人居住过的“家”。

我家世代是倪金司的佃戶。到我父亲手上，家貧如洗，一家人盖一件又黃又烂的棉絮。一根扁担，一把鋤头，就是我家的“财产”；为倪家盘田上租，就是我家的“祖业”。

那时候，穷人还是有自己的願望，就像我父亲心里所想的那样：“富人命在錢多势广，穷人命在人丁兴旺。多有几个帮手，将来总有一天会有自己的田地和牛羊的。”所

以，我們兄弟三人的出世，也給我父親帶來了一些幸福和喜悅。

但是，在舊社會，窮人的願望根本無法實現。1908年，我八歲那年，昆明遭旱災，收點糧食還不夠上租，一家人兩頓吃點南瓜煮野菜，我的一雙手瘦得像根枯柴。為了活命，母親只得背着剛出生的弟弟到車家壁、董家村一帶討飯。她每天清早出門，跑遍村子，晚上帶回幾碗殘湯剩菜，不夠我一個人吃。

父親看看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便喊哥哥挑着籬筐，低著頭走進倪家大院，在借債簿上按上了手印，向倪金司借了一石五斗米。臨走時，倪金司的管家還交代說：“國才，你明年得挑三石米來還！”父親連聲答應。在路上，哥哥問父親：“爹，我們借一石五，怎麼明年要還三石？”父親說：“孩子，這是利息！”父親想到這尖刀一般的高利，心涼了半截。但是在災荒年，窮人又有什麼辦法呢？爹心裡盤算著，三個孩子慢慢得力了，但願天公開眼，風調雨順，來個好收成，也許有還清這閻王債的希望。

可是那幾年軍閥混戰，鄉保長到處抓丁派款，地主趁機加租加押，窮人骨頭里的油都給榨干了。我們一家人終年四季苦死苦活，當年的租子都交不清，哪裡有能力還債！這樣，向地主借的一石五斗米，一年翻一番，三石變六石，到我十二歲那年，便翻到四十八石，欠下了千年萬

代也还不完的閻王債。

揮泪別爹娘

进城当学徒

为了找条活路，十三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昆明的一家錫箔店当学徒。清早，母亲含着眼泪把一个小包袱递在我手里，亲切地嘱咐我说：“孩子呀！到那里比不得在家，要听人家师傅的话！”我接过包袱，哽咽地答应着，就随父亲进城。

下午，我們找到了那家錫箔店。跨进门去，就看見一个又高又大的汉子走了过来，父亲忙推我说：“快給老板磕头。”我怯生生地跪下去，給他磕了四五个响头。只听见他像雷响一样地说：“好啦，好啦，到我家要老老实实地干活，学手艺可不能馬馬虎虎！”

我原想学点手艺，出师后可以帮补帮补家里。誰知到他家后，老板把我交給老板娘使喚，每天洗痰盂、倒馬桶、挑水、煮飯、洗衣服，稍有差迟，就要挨耳光。有一次，我到河边洗衣衫，一时不小心，一件衣服被水冲走了。老板知道后，勃然大怒，罵声：“飯桶！”拿起錘头就朝我头上敲；又把我按在核桃壳上整整跪了一天。

后来跟师兄在店里干点杂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干到半夜才收工。飯不让我吃饱，衣服又不給我穿够。

一个冬天的下午，外面下着大雪，我只穿两件单衣，坐在鋪前做活計，冷得渾身发抖。不得已，我和两个师兄烧了几块柴炭取暖。老板看見了，走过来一脚把炭火踢翻，就“啪啪”給我两个耳光，大声罵道：“畜生，烤火你們还不配呢！”我一直在这里忍气吞声地熬了五年，什么技术也沒有学到。

反动派估拉壮丁

一年間三人丧命

自从我到昆明当学徒以后，哥哥成了亲，后来又添了两个侄子，我弟弟也长到十二、三岁了。父亲望着家里一时“人丁兴旺”，心中暗暗高兴。但是，穷人的日子毕竟像一条流着苦水的长河一样，永远也沒有甜的时候。

1918年，有一天，哥哥正在家里修房子，伪鎮长带着几个乡丁闖入我家，就像餓狼遇着小羊，把我哥哥五花大綁捆了起来。当时父亲領着弟弟上山砍柴，只有母亲和嫂嫂在家。母亲見哥哥被捆绑起来，不知我家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忙带着嫂嫂向伪鎮长求情。伪鎮长虎着脸大喊，“滾开！”母亲拉着哥哥不放，伪鎮长一脚把母亲踢翻在地上。母亲口吐鮮血，頓時就昏死过去。嫂嫂一見，伤心地扑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媽、媽，你醒一醒！”被捆着的哥哥气憤地罵道：“狗杂种，我姓周的犯了那样法？”几个乡丁，連



打帶推把哥哥拖走了。嫂嫂一面追一面喊：“你們不能把他抓走！你們不能把他帶走！天哪！”

傍晚，爹从后山回来，知道哥哥被抓走了，老伴被打得奄奄一息，气得捶胸頓足。但是人家是当官的，我們是

个穷得叮当响的佃户；人家打你，把你抓去当兵，你又能怎么样呢？

自从哥哥被抓走后，一家老小，个个愁眉苦脸，母亲一想起哥哥就放声大哭，父亲只得安慰老伴说：“孩子的妈，想开点，轮到派丁，穷人是躲也躲不过去的，一年两载总会回来的。”

可是，哥哥永远也回不来了。

才过了几个月，就传来晴天霹靂般的噩耗。有一天，伪镇长派人到我家报信说：“周国才，你儿子被土匪打死了，快到厂口领他的尸首。”父亲听见了，顿时觉得天昏地转，一串串的老泪簌簌地涌了出来。他绝望地向天哭诉：

“老天，你怎么不长眼睛！”母亲和嫂嫂更是哭得死去活来。那时我还在昆明城里当学徒，父亲进城卖柴，才把这件伤心事告诉我。我几次向老板请假，都被他拒绝，只得暗暗地伤心落泪。

从此，我家生活重担完全压在年过六旬的老父亲身上。我家越穷，地主倪金司越是天天来逼债。不得已，将弟弟送给倪家抵债，到他家当小长工。嫂嫂想到家中生活这样悲惨，想起死去的丈夫，自己又没有能力抚养两个孩子，常常背着人流泪，身体也一天天瘦下去。有一天晚上，她终于悬梁自尽了。身患重病的母亲，挣扎起来，搂着嫂嫂的尸体，泣不成声。一气之下，她也含恨离开那罪

恶的人间。一天死了两个亲人，父亲伤心极了。后来是几家邻居帮忙，才草草把母亲和嫂嫂埋葬了。

我闻讯之后，立即从昆明跑回家。父亲见我回来，泪流不止，我也放声大哭。三五年间，这些地主和恶霸竟把我们整得家破人亡！看着父亲已经年老力衰，实在不忍心再让他受苦。我对父亲说：“爹，你家也老了，田里的活就交给我吧。”父亲回答说：“孩子呀，我们穷人到那里也是受苦，回来种地也好。”

地主逼死小弟弟

匪兵枪杀老爹爹

我回家后，灾祸又接二连三地落到我家。

大地主倪金司死后，他儿子倪土培当家，这人比他父亲更加凶残。我们村子外面常有豺狗出没，一到晚上，那家也不叫孩子出门。这年中秋，倪土培在家饮酒作乐，却逼着我弟弟一个人到村外给他看守粮仓。弟弟虽然心中很害怕，但不去就要挨打，只得大着胆子去。这天晚上虽是中秋，天上乌云乱窜。到了半夜，弟弟坐在破棚子口打盹。忽然，一只恶狼跳过来，一口咬住了弟弟的脖子。可怜他来不及呼救，就被咬死了。等到村里的人发现，弟弟的肚肠都已经被狼吃光了。狼心狗肺的地主，却连我弟弟的尸首都不收。可怜弟弟只活了十几岁，就这样给地主害死了。

我們眼淚還沒有揩干，橫禍又飛到我家。有一天早上，我爹看見十幾個偽官兵鬼鬼祟祟來到村里，分明又是耍抓兵。爹急忙轉進屋里，對我喊道：“周標，快跑，抓兵的來了！”我正在磨砍柴刀，聽說抓丁，我就跳了起來：“狗日的，再來抓丁，我砍了他！”父親忙說：“你想死啦！趕快從後門跑！”我說：“你呢？爹。”我感到十分為難。爹大聲說：“我老啦，死也死得啦，他們能把我怎麼樣？”門外一陣亂轰轰的腳步聲，接着是一陣敲門聲，只聽見有人在門外罵道：“給老子快開門來！”爹使力把我往後門一推，我急忙逃走了。

那些偽官兵一擁而入，氣沖沖地問：“你兒子呢？”

“大兒子被你們抓去當兵，給土匪打死了。”

“二兒子呢？”

“在省城還沒有回來。”

“三兒子呢？”

“給東家看倉，狼吃了。”

“好硬的嘴！兒子不在，老子去頂！”這些土匪就連打帶推，把我父親抓走。

父親在刺刀尖下不得已給這些王八部隊挑了三天担子。第四天中午，乘那些壞蛋休息的機會，扒開茅草逃走了。可是沒有跑了几步，就被發現了，一時喊聲四起。我爹還是拚命往前跑，剛到一座小橋，一顆子彈穿透他的胸膛，便結束了他苦難的一生。

吃人的旧社会，真是无边苦海！不到八年，反动派就活活逼死了我五个亲人。这血债，我怎么能忘记！

倪家设计陷害

枉坐两年冤狱

在旧社会，穷人祖祖辈辈走的是一条洒遍血泪的道路。父亲死后，我结了婚，养儿育女。为了一家人的活命，我依然拿起父亲遗留下来的锄头去种倪家地主的田地，挑起那对簸筐给地主上租。我一家人还是吃糠咽菜，缺穿少盖的。可是这样的苦日子，反动派也不让我过下去。

1934年遇上春荒，一家人天天吃些糖梨花、苦麻菜。我不忍看着两个孩子活活饿死，便到门前砍了我家祖传的



几棵柏树卖了。誰知地主倪士培想霸占这十多棵柏树，就到昆明伪法院誣告我“破坏公产”。在法庭上那些狗法官給我加上“私伐公产”的罪名，我气极了，大声反駁：“我砍了自家的柏树，犯了哪样法？”他們理也不理，竟判我两年徒刑，把我投进監獄！第二天，地主倪士培派了几个狗腿子，将我家的柏树全部砍了卖给伪水利局。我进了監獄，我老婆无依无靠，只得带着儿女討飯去。

两年后，我离开監獄，带着滿身的病，又回到漁街子。好不容易我才将流落在昆阳的妻室儿女找到。那时，田地早已被地主夺了佃，我只得四处卖工，一家人吃早沒晚地混日子。

卖身契上按手印

反射炉旁当奴隶

抗日战争爆发后，蔣介石匪帮的伪中央資源委员会在漁街子一带建立“中央电工器材厂”。就在这个时候，我迫于生活，在卖身合同上按了手印，在工地上当个临时工。在监工的鞭子下，我們成天挑土、挖水沟、抬石头。第二年，熔炼窑建成了，我也就进去当熔炼工，給資本家当奴隶。

解放前，在高温的反射炉旁干活真受罪！下面的一首歌，唱出了旧社会冶炼工人的痛苦：

太阳落了山， 我去上夜班。
炉前出铜苦， 炉后烧火难。
给人当牛马， 哪天当得完！
老板住高楼， 我睡烟巷边。
他吃鱼和肉， 我吃糠菜饭。
不知哪一日， 才能把身翻！

冬夜，刺骨的寒风吹打着一间牛厩，那就是当年“中央电工器材厂熔炼窑”的“工人宿舍”。工人们无衣无被，耐不住风寒，只得偷偷跑到烟尘弥漫的烟巷边去睡觉。有一天深更半夜，监工一脚踢开破门，大声骂道：“起来上班，懒鬼！”可是除了迎面扑来一股牛屎味外，没有任何回音。他继续大叫：“你们睡死啦！”仍然没有半点回音。他亮起手电筒，顺着电光，在一排排用烂土基搭的木板上面，只见一块块草席，却没有一个人影，就恼怒地奔向车间，才在烟巷边找到了工人。他一边扬起鞭子乱抽，一边骂道：“这些混蛋，倒会找安逸！”我挨了一鞭子，赶快爬起来，抓着棕衣便向炉子上跑，只听见后面监工像狗一样嚎叫的声音。

简陋的熔炼室，烟尘弥漫，热气腾腾，我们打着赤膊，穿着木板鞋，来来往往抬着包子出铜。在一千多度的高温下，我们袒胸露背地干活，没有任何防护用具。铜水四处飞溅，落在身上，立即皮焦肉绽，痛得发抖。我身上被铜水烫伤的伤疤，数都数不清。有多少冶炼工人被铜水

燙傷後不能再為資本家勞動，被開除出廠，流為乞丐。

1943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和李雲忠爬到反射爐頂取暖，兩個人縮成一團。監工望見了，二話沒說，舉起鞭子就抽，打夠了，又把我們帶到“廠長室”。偽廠長，鼓起一雙三角眼睛，拍着桌子大罵：“你們怠工，還了得！”就命令監工，“給我重重的打！”監工把我們打得遍身青腫，方才住手。

第二天，監工把一張紙條丟給我，用皮鞭指着大門，冷冷地對我說：“叫你滾蛋！”我被開除了。我滿懷仇恨，憤憤地走出車間……。

解放前，在漫長的五十年中，我經歷了皇帝、總統、軍閥、國民黨反動派，一年比一年痛苦。一連串悲慘的災禍，整得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我對舊社會有多少仇恨！我像所有的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勞動人民一樣，盼望着解放。

幸福全靠共產黨

好了傷疤莫忘痛

1949年雲南解放了，我重新進廠，成為一個光榮的冶煉工人。出了苦海見青天，我感到特別的幸福，干起活來，一點也不感到疲勞。在黨的親切教導下，我的階級覺悟逐漸提高，1953年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入黨時，我感到萬

分幸福，心情很激动，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加积极地劳动，为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我在增产节约方面作出一点成绩，大家就选我为模范，这使我感到很惭愧。旧社会把我摧残得遍体鳞伤，党送我到白鱼口疗养院把我医好了。

生活越幸福，我越思念党的教导，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虽然胜利了，国家还穷，要听党的话，好好劳动，生活艰苦点。厂里几次给我房子，我都不要，我还是住在我的老家——渔街子。当然，不是住在祖祖辈辈住过的破草房，而是住进当年大地主倪金司的高墙大院。十多年来，我起早贪黑地上班下班，不嫌路远。老伴常对我说：“咋个不兴向厂里要间房子，五六十岁了，风里来，雨里去，多不方便。”我总是对她说：“你不想想，过去我们住哪样房子，现在住哪样房子，不能忘本！现在只不过多走点路，有哪点不好？再说，住在村子里，你还可以参加农业生产。”老伴也没有话说了。

1955年，党号召不能升学的青年学生到边疆垦荒，增加农业生产。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动员我儿子周茂去报名。老伴知道了，就对我说：“我们只有一个独儿，你就舍得把他送走！”我还是把老伴说服了。临走那天我去送行，儿子和媳妇在车上对我说：“爹，你放心，我们一定记住你的话，一定不辜负党对我们的希望。”听了这几

句話，我乐得合不攏嘴。

我今年六十四岁了，領導要我退休。但是我不想退休，我要为党工作到最后一口气。我回忆了我家在旧社会五十年的悲惨遭遇，对比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我感到社会主义制度太好了，我工作得太少了，我才为新社会工作了十几年，怎么能坐下来吃閑飯呢？我把退休証退还给厂长，对他說：“我不退休，我还不算老，我是个党员，我还要为党工作。”厂长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

几年来，我在平凡的劳动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增个砖添个瓦，想不到党和人民却給我很高的荣誉，年年把我选为劳动模范。我深深地感谢党的教育，感谢同志們的帮助。我一定要牢牢記住党的話，“好了伤疤莫忘痛”，永远不要忘记我家的血泪仇，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穷人在苦海中受折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給的任务。

郭起中 整理

賀惠賢 插图

五十年的遭遇

昆明鐵路局安寧工務段工人 刘长忠

我今年六十三岁。在万恶的旧社会，我被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强盗折磨了五十年。这五十年的血泪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家万代也不会忘记。

孤 儿

我的老家是河南省信阳县，爸爸从小给地主扛长工。我五岁那年，淮河泛滥，家乡遭水灾，到处是一片汪洋大海。狠心的地主把我爸爸赶了出来。灾荒年，在乡下根本找不到活干。爸爸和妈妈就领着我和妹妹到信阳城。一到信阳城，街头巷尾挤满了逃荒的农民。一家四口人，眼见就要饿死。万般无奈，爸爸和妈妈只得领着我们兄妹俩去讨饭。

我们白天跑遍四乡，讨不到几碗残汤剩菜。穷人家锅都揭不开，哪有剩饭；地主老财不但不给，还放狗出来咬

我們。爸爸和媽媽总是自己挨餓，舍不得吃，把討得的一小点东西給我們兄妹俩度命。不久，爸爸就餓死在路边。我們穷得連一床烂草席都沒有。媽媽在路边荒地上挖个坑，就将爸爸埋掉。我們扑在爸爸的坟上放声大哭。天黑了，媽媽又領着我和妹妹走上乞討的道路。

我們到处流浪，天天挨餓，后来，媽媽和妹妹也活活餓死在一所破庙里。我向人家討得一床草席，把她們裹着，就算是埋掉了。从此，亲人都餓死了，只留下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那时，我想帮地主干活，換几口飯吃，可是几家地主都不要我，嫌我又瘦又小，从身上榨不出油水。我只得拿起父母留給我的破飯碗和打狗棒，东村西村流浪。直到十二岁那年，地主刘祥云看我大了，可以干活了，才把我收留下来，給他家放牲口，我也就結束了叫花子生涯。

头上的伤疤

到刘家后，要給他家喂十六头牲口。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晚上干到半夜都不得休息；可是刘祥云这只老豺狗天天罵我“偷懶”，不是打我，就是不給我飯吃。給地主干活并不比討飯好过！

最痛苦的是，天天还要遭地主儿子的毒打和侮辱。刘祥云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他既不上学，也不干活，成天

东游西荡，随手鞭打他家的长工和丫头。他欺我没得爹娘，穿得又破又烂，经常指着我的脸骂“驴子”。这还不说，天天拿棍子敲我的头开心。我气不过，真想和他拚两下。

有一天，我在喂牲口，他用棍子戳我的裤裆，还说：“刺中要害”。我又痛又气，就抓把驴粪往他脸上撒。这个小王八气得咬牙切齿，返身跑回家中拿了一把菜刀，又朝我这边跑来。我害怕极了，赶快逃走。他很快就追上我，举起菜刀，使力往我头上砍。我感到一阵剧痛，惨叫一声，就倒在血泊里。村里许多人都跑过来看我。老地主也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看了我一眼，鼻子哼了一声，说了一句“活该！”又溜回家去，把我丢下不管。村里的人看见我满身是血，都十分气愤。后来，一个姓周的老伯把我抱回他家，将我救活，我这才从死里逃生。我在周老伯家住了三个月。伤口好了，在头上留下一道两三寸长的伤疤，永远成为旧社会的罪证。

周老伯也是个贫苦农民，他不能长期养着我。伤好后，我就到离这里十里地的一个村子，在一个姓林的地主家干活，一年一千二百文铜钱。我给林家地主先后当了六年牛马。十九岁那年，听说平汉铁路局在信阳城招工，我就离开林家，跑到信阳城。

凶恶的“狼狗”

那时进铁路当工人要铺保。我在信阳无亲无故，就狠了心，把过去积攒下来的六吊钱拿出来，买了个铺保。我想，当工人得学点技术，月月有工资，总比给地主当长工强。谁知不然，在铁路上，不但有资本家、资本家的走狗，还有帝国主义强盗，个个和老财主一样凶恶。

我进铁路后，包工老板把我分派在非班（相当于现在的栈桥大修队）。在这里，什么技术也学不着，整天干重活，不是挑沙子就是抬石头，每天天不亮就吃饭出工，到了天黑才准回家。在旧社会干活根本就沒得个规定。你干累了，想休息一下，监工的皮鞭就朝你背上抽。活计干得有小点儿不合，监工就用铁锤打你的脑壳。许多工人被打得晕死在地上。我们这个班，每年都有几个工人弟兄无缘无故被监工打死。工人死后，监工就叫人拖到附近的山坡上，挖个坑埋掉了事。在旧社会，铁路工人不如一条狗！

我们吃的是什么饭？天天是包谷掺野菜，野菜掺包谷，喝的是白菜萝卜汤，有点盐巴就算是“打牙祭”。就像这样的“饭”，监工也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每人每顿只得三小碗，你想多添一碗，要当心监工走过来打耳光。我们每个月交两块钱的伙食费，可是大部分都给监工私吞了。

那时候，在铁路上剥削和压迫工人的，还有如狼似虎

的帝国主义分子，我們叫他們“狼狗”，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野兽。有一个监工叫馬大沙，意大利人。这个家伙最瞧不起我們中国人，經常随口罵人，随手打人，我們个个对他恨入骨髓。他还私設牢房，經常将所謂“看不順眼”的工人，安上“可疑分子”的帽子，命令中国监工拖进牢房。工人被关进牢房，不是被打死就是病死，沒有一个活着出来。死在他手上的工人弟兄，不計其数。有一天上午，我又饿又渴，就拿个碗打点水喝。这个没人性的帝国主义强盜，竟走过来夺去我手中的碗，又使力朝我头上砸，我的头額立刻鮮血直淌。又有一天中午，我太累了，飯又沒有吃飽，我想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不料我刚坐下来，就被这只“狼狗”瞧見，他对我大吼一声：“你不干活！”跑过来，就用“文明棍”打我的脚杆。月底，他竟扣了我一元的工資！那时我們每月工資只有五元四角，每个月包工老板照例要剝削一元，而帝国主义“狼狗”又常常捏造种种借口，又咬去一份。所以，我們工人年年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日子。

在 枪 口 上

1930年，我們被調到五再河修大桥。修桥工段的段长名叫答巴拉，也是个帝国主义分子。他限令我們在七天之內修好五再大桥，并且對我們威胁道：“七天修不好，把你

們通通槍斃！”工地上來了許多反動軍隊，每個工人屁股后都跟着一只持槍的黃狗。我們被迫干了五天五夜，個個眼睛都熬紅了，腫得像個核桃，有好些工人在晚上暈倒后，就掉下河淹死了。

當時只有我一個會燒電焊，這個帝國主義“狼狗”就派兵逼我不分晝夜地干活。到了第五天我一雙眼睛都熬腫了，頭昏腦脹，身上一點力氣都沒得。第六天，我正在几公尺高的橋架上燒電焊，突然眼睛發黑，就暈了過去。幸好吊繩把我吊住，沒有掉下河去。不料帝國主義分子答巴拉看見我不動，竟開口大罵：“你敢怠工！”就命令監視我的兵痞向我開槍。槍聲一响，一陣劇痛，我蘇醒過來，低頭一看，腳上鮮血直冒，我怕遭第二槍，連傷口都不敢包扎一下，咬着牙齒繼續干活。第二天，我的腳發炎浮腫，路都走不動，但是答巴拉還是逼我爬上橋架上燒電焊。這些帝國主義強盜，比虎狼還毒十倍！

橋修好了，可是有二十幾個工人弟兄被他們逼死了。我总算沒有死掉，但腳上傷口生了蛆，眼睛也熬壞了。現在我的腳走路不得力，天不黑眼睛就看不清，就是那次給弄壞的。

官兵如盜匪

抗日戰爭爆發后，反動派將我們從平漢路趕到粵漢路

干活。1938年，又用汽車把我們从粵漢路拉到云南來為他們賣命。到云南后，到处兵荒馬亂，物價天天上漲，生活更加痛苦。我三十八歲了，還是光棍一條；有時也想成個家，可實在養不起家！監工和老板常常辱罵我：“連狗都養不起，還想討老婆！”在舊社會確實是這樣的，我雖然是一個有二十年經驗的工人，但是窮得連狗都養不起！

1940年，我已有四十歲了，才靠着窮兄弟的幫忙，和一個農村婦女結了婚。那時，反動派把我派在大板橋當橋工，橋邊一間破木板房子就算是我的“家”。沒有过上几天平安日子，災禍就突然闖上門來。第二年冬的一個下午我生病躺在牀上，有七個國民黨匪軍破門而入，個個賊頭賊腦，把我家中稍為值錢的衣物都搶劫一空。禍不單行，沒有多久，又撞進一群黃狗。這群沒心肝的野獸搶不着東西，竟放火把我的破木板房子燒掉，然後揚長而去。我趕快從牀上下來走出門，差點被燒死。我老婆在附近的地里干活，一見火光，趕快跑回來，但是“家”已被燒光了。這一下弄得我們沒有吃的，沒有穿的，也沒有住的。我向偽段長反映了這場災禍，請求幫個忙。偽段長只說一句：“你自己想辦法。”听都不耐煩听。不得已，我們跑到附近村子里，一家農民很同情我的遭遇，讓我們在他家的豬厩里住下。從此，我們就以豬厩為“家”天天吃點包谷摻野菜度日。像所有的勞動人民一樣，我們極端仇恨國民黨反

动派，天天盼望解放。

感 謝 毛 主 席

我五十岁那年，云南解放了，毛主席的军队来了，我终于熬出头了。解放后，我这个像叫花子一样无衣无食的老铁路工人，住上了瓦房，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日子。党从各方面关心和照顾我这个被反动派折磨得九死一生的老工人。党调我去学习，又培养我当工长。后来我身体不好，眼睛也不方便，领导又根据我的要求，照顾我当个看桥工。

现在我的生活十分幸福。我有四个孩子，老大是个人民教师，老二上高中，老三上初中，老四上小学。在旧社会，我的童年是在乞讨中度过，受尽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的折磨，满身伤痕累累。在旧社会我从来不敢梦想我能过这样幸福的生活。我从心底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的毛主席。

梁 湘 整理

階級仇恨記心間

明良煤矿新平坑 崔应学

为逃荒亲人尽失散

我家原在宜良草甸。1939年，草甸遭旱灾，田土干裂，庄稼颗粒无收。父亲和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和我到外面逃荒，只有年老的祖父留在家。后来，我们一家人就流浪到昆明。那时，我只有十岁。

我们在昆明没有亲戚朋友，又没有钱租房子，只得在南站外的一个桥洞下用几床破席子和几根枯树桩，搭个草棚，就在那里安了“家”。父亲每天到街上挑扁担，我和母亲到火车南站捡煤碴，一家人吃点菜叶子熬稀饭，勉强度命。

有一天，父亲给一个老板挑东西，因为担子太重，挑到德胜桥时，绳子忽然断了，把人家的行李弄翻了。老板便把我父亲送到宪兵司令部关起来。关了一年多后，父亲

帶着一身重病回家，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母亲向人家要得两床破席来裹尸，請人抬到双龙桥边的乱坟堆埋了。

父亲死后，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母亲只得領着我們沿街討飯；討得一碗吃一碗，討不着一家人就睡在桥洞底下挨餓。六月間，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几天討不着一碗飯，一家人餓得路都走不动。母亲只得忍痛将妹妹卖给餓缺营的一家地主当了头，得了三升米。不久，母亲也活活地餓死在中扎的龙王庙里。

母亲死后，我带着七岁的弟弟，拿着一个破碗，到处流浪乞討。有一天，走到双龙桥外的南坝村，弟弟哭着要找媽媽，肚子又餓，我就把弟弟領到三棵树底下，叫他在那里等着，我去討点飯給他吃。我走遍了村子，才討得几口餓飯，就赶快出村来，可是弟弟不在了。我边哭边找，找了一天，始終找不到弟弟。直到現在，我还是沒有找到弟弟的下落。

母亲餓死了，妹妹卖了，弟弟丢了，回家又沒有路費，我只好繼續在昆明街头流浪乞討，心中日夜思念着在家乡的老祖父，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有一天，我在教場坝討飯，看見迎面走来一个討飯的老人。走近前一看，原来就是我年老的祖父。爷孙相見，抱头痛哭。我向祖父哭訴了父母和弟妹的悲惨遭遇，他还沒有听完就昏倒在地上。后来，多亏几个过路的人将祖父抬到墙根脚躺着休息。当

天夜里，老祖父就死了。从此，我就失掉了所有的亲人。

走投无路上矿山

祖父死后不久，我就离开昆明，沿途讨饭，两、三个月才回到家乡。我在家乡四处帮人，换几口饭吃；找不到活干就讨饭。十四岁那年，我流浪到汤池街。有一天，因为讨不着饭，我坐在街旁哭。一个过路的人走过来，问了我的情况，就对我说：“你莫哭，明良煤矿公司在这里招工，我领你去瞧瞧，能上矿山，好歹得几口饭吃。”他就领我去见那个招工领班。领班答应将我收下，并欺骗我说：“三顿白米饭，每月有工资，好得很。”当时我年纪小，信以为真，就跟他上山。

到了明良煤矿，只见四面高山，山沟里，稀稀疏疏躺着几排茅草窝棚，一片荒凉景象。吃的是糙米饭，吃一两碗饭就拣得出半碗谷壳、稗子和细沙子。晚上在破窝棚里睡，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个个都是黑漆漆的，披头散发，瘦得只剩皮包骨头，怪可怕的，我心中很后悔。

本来我想第二天就逃走，但是老工人彭正兴对我说：“跑不得，给他们抓着，就会把你打死。”他还说，前久有一个工人逃跑，半路被矿警逮住，老板就叫两个狗腿子，用板斧把这个工人弟兄的膝盖挖掉！我听了又气愤又害怕，逃跑的念头也就暂时打消了。

第二天，一个把头领我去见一个姓张的包工老板。这个家伙侧着头冷冷地看我一眼，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没有名字，我父亲姓崔，请你家给我取个名字。”他大声说：“你以后就姓普，叫普长才，不要再姓崔了。”我哀求说：“老板，我家三代只剩下我一个孤人，请你家还是莫改我的姓。”张老板鼓起眼睛，大声骂道：“小杂种，你敢多嘴。滚开！下洞背煤去！”后来，我才知道，“普长才”是另一个工人的名字，不久以前，他被包工老板打死了，因此，拿我来顶替他，从此，大家就叫我“普长才”，我便开始了悲惨的矿工生活。

人間地獄受折磨

那时资本家不准煤矿工人穿衣衫进矿洞，事实上工人也买不起衣衫。我学着老工人，把衣衫和裤子脱下，用块麻布系在胯下遮羞，工人都叫穿“骑马布”。然后，提着一盏鬼魂灯（香油灯），背上笆籬，就进洞背煤。矿洞又黑又潮湿，有时还会闻到一股死尸的腥臭味，闷得人透不过气来。我跟着老工人，摸一步走一步，心里害怕极了。

监工强迫每人每次要背满满的一笆籬，约七十公斤。那时我才十四岁，只背得动半笆籬。经过大点的洞子，要弯着腰走；经过又狭又矮的洞子，还得背着煤爬着走，两只手在



前，两只脚跪着，一步一步蠕动，头上冷汗直淌。这种牛马活，比盘庄稼要苦十倍！我爬到洞口，已经精疲力竭，一个姓同的监工跑过来，提起明亮的煤石灯一照，开口就骂：“你这个小杂种，怎个背半笆籬！刚到就偷懒！”他举起鞭子就朝我身上抽打。旁边几个老工人见了都很生气，但敢怒不敢言，监工把我打够了，又指着我的脸威胁道：“以后你再背半笆籬，我用火棍打死你！”

后来我还是背半笆籬，因为我只背得动这些。不久，这只资本家走狗又在六号眼的地方遇到我，他见我还是背着半笆籬，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你这个小王八蛋，还是背这小点！”我说：“先生，背多了我爬不动。”他大声嚷道：“你敢强辩！”就打我一个耳光，并且命令我：“给我跪着走！”我

不跪，他一脚把我踢倒。我只得背着煤，跪着走。我左脚上前，他用棍子打左脚；我右脚上前，他就打右脚。他把我的一双脚杆和膝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淌；有多少煤渣和碎石子戳进血肉里，痛得我脸上淌虚汗。最后，我支持不住，就昏倒在路边。下班时，还是彭正兴等八个老工人把我扶了回去。第二天，监工照样逼着我下矿井背煤，真是走一步流一滴眼泪。后来，我脚上的伤口发炎化脓，拖了一年多才好掉。现在，我的一双脚杆上还有二十多处伤疤，在我的膝盖上，还看得见一块块的黑斑。

那时煤炭公司从包工老板手中收煤。如果煤里面的矽超过规定的数量，包工老板就要受处分，所以包工老板最怕煤里面掺矽。许多工人就故意用煤里面掺矽这个办法来反抗包工老板的压迫。自从那几次被毒打以后，我更加仇恨包工老板，就学老工人经常偷偷地在煤里掺矽，以泄我心头之恨。有一次，监工在我的笆箩里找出好些矽，几脚就把我踢翻在地上。下班后，监工把我喊去，命令我站着，伸出双手，张开手掌，然后叫两个狗腿子用扁担狠狠地打我的手掌。每打一下，痛彻肺腑，我的右手被打得炸开一道两寸多长的裂口。第二天，手掌肿得像馒头。后来伤口虽然好了，但在我的右手掌上留下一道仇恨的伤疤。

资本家用来摧残工人的酷刑，除了吊打外，还有所谓“三大纪律”和“八大法宝”。三大纪律就是不准逃跑、

不准乱說乱动、不准迎风鬚皮。最惨无人道的是“八大法宝”：脚镣、手铐、老牛拔桩、火烙、紧箍咒、軟板凳、挖膝盖、活埋。无数工人惨遭資本家的毒手，含冤而死。我认得一个工人弟兄叫聶正昆，就是被火棍烙死的。有一天聶正昆只多睡了一陣，赶不及上班，就想跑到厨房躲起来。不料刚进厨房，正碰上包工老板。老板恼怒地叫他站住，派人喊来八个狗腿子，将聶正昆吊起来。他們把一根三尺多长的鉄棍子烧得紅紅的，就用这根火棍把聶正昆打得死去活来。聶正昆遍身都被火棍烙焦了，死时全身潰烂，我們工人見了这种惨象没有一个不伤心落泪。

那时井下沒有通风或防水設備，資本家也不給我們任何防护用品，工人光着身子进洞干活，連安全帽都沒有。在井下干活，就像我們經常說的“生死只隔一張紙”。許多巷道不按規定架棚，經常发生倒塌事故，把許多工人活活压死。我們挖煤时，有时还挖出人的尸骨和油灯。有一次，我正在挖煤，突然，一大块煤嘩啦垮下来，把我埋掉，我立刻人事不省。幸亏何紹堂等几个工友在旁，赶快将我挖出来，我才从死里逃生。可是监工来了，不管你的死活，还强迫我到別处繼續挖煤。

資本家常常逼我們往火坑跳。1947年，老平坑二下山做了一个順槽，那里由于頂板压力大經常发生压死人的严重事故，但是那里煤的质量好，資本家不管你死活，天天用

鞭子赶着工人豁着命在那里挖煤。有一天，“轰”一声，又有三个工人被活活埋在里面。

不管死了多少人，资本家总是不闻不问。包工老板常说：“死匹骡子要花我三两金子，死个工人不花一文钱。在东川、宣威，有的是人；他们把大洋芋吃完了，自己会来。”工人死在洞里，就丢在洞里；工人死在“宿舍”，就拖出去丢在箐沟里喂乌鸦，连草席子都不给一床。离我们“宿舍”不远的几条箐沟成了“万人坑”；杂草丛中，尸骨垒垒，远远的就闻得到一大股腥臭味。每当我们看见乌鸦在箐沟大吵大叫，都会打一个冷战。我们都明白，又有一个或几个工人弟兄永远离开了人间。

解放前，我在明良煤矿六、七年，被折磨得一身是病，又瘦又黑，简直不像个人样。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来了，我早已被资本家丢在箐沟里喂乌鸦了。

人民的矿山

解放后，旧社会的深山魔窟，变成了人民的矿山。我们这些被奴役、被压迫的“黑老鸹”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政府接管了这个矿山，就彻底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拿安全生产来说，我们矿上已安置了机械通风设备，派专人担任瓦斯检查员，建立了安全责任制度。在旧社会，我们工人“身穿骑马布，手提香油灯，肩上背筐

籬，揩汗用竹片。”現在，絞車，電溜子等機械設備代替了筊籬。井下工人不但有舒適的安全帽、明亮的礦燈，而且還有水靴和工作服。

在解放前，我們的生活十分悲慘。“穿的破麻袋，吃的麻麻湯。蓋的鋼絲被（蓑衣），墊的响鈴毯（破草席）。”這四句歌謠概括了我們當時的痛苦生活。干的牛馬活，飯菜不如狗吃的，老工人都會唱這首歌：

舊社會，真黑暗，
工人吃的什麼飯：
老鼠屎，細沙子，
谷壳稗子往里摻。
黃豆渣，干酸菜，
攪成一鍋麻麻湯。

這種豬狗不如的生活，現在的年青人是很難理解的，我有幾年沒有洗過一次澡，也沒有理髮，頭髮長了，就編扎起來，挽在腦背後。解放後，我才真正過人的生活，生平第一次住上瓦房，睡在床上，蓋上棉被，穿上棉衣。所以，新社會的新生活，我感到特別甜。

解放後，黨恢復了我的本姓，給我取名崔應學，醫好了我從舊社會帶來的疾病。過去我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識，經過黨的培養，現在我可以看一般的書報。由於黨的培養和教育，覺悟不斷提高，我於1956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入党时，我激动得眼泪直淌。我想起我家祖祖辈辈是受压迫剥削的贫苦农民，解放前我是个要饭的孤儿，我今天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个成员，完全是党培养的结果。

今后我一定要牢牢记住党的教导，把阶级仇恨永远记在心间，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积极为党工作，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到底。

林桐森 陈 燕 整理
贺惠贤 插图

断手以后

昆明铁路局开远折返段工人 赵 森

报纸上登载了上海工人王存柏断手再植的消息，我听了心里很感动。十九年前，在反动派统治下，我因为工伤断手，可是我的遭遇多么悲惨！

我原名傅兆生，十四岁那年进当时的滇越铁路当工人。报到时，法帝国主义分子胡说什么我的名字不好听，不顺口，就把我的原名弃头留尾，强迫我改名赵森（和兆生同音），要用“赵森”的图章才给工资，我也只好改名赵森了。

我在滇越铁路干了二十四年小工，到1941年，反动派才给我个大车（相当于司机）的职位。因为我沒有钱给伪段长送礼，几年都不得开车，只能帮大车打杂。直到1945年初，开远机务段人手不够，反动派才叫我跑车。可是不到四个月，我的手就被火车碾断了。

在旧社会，反动派不考虑工人的生命安全，在矮小的隧道里也竖电线杆，并且安上丁字形横挡。1945年4月15

日，火車从开远出发。那时車上只有两个班，每組有一个大車，一个烧火。火車开到徐家渡，本来應該換班，可是領班逼我們繼續当班。下午四点左右，火車进入現在的第27号隧道，我正要从煤水車上跳下司机棚，突然被电綫杆的橫挡刮下車去了。不幸，衣服的后領被閘瓦下面的鉄鈎挂着，我被火車拖了十多公尺，右手就被滾动着的輪子輾成两节，顿时我就昏死过去。火車停下来了，同組的老陈才赶快把我抱上火車。火車到滴水，他又打电話給宜良的机务段和伪鉄路医院，請他們想办法搶救。

晚上八点钟火車到了宜良，旅客走后，站上冷清清的，不見个人影，站上那些当官的都走光了，車上的領班、小登（相当于車长）也走了。在旧社会，反动派对工人的死活是不关心的，不要說断了手，就是断了头，他們也是不聞不問。老陈将我背下車来，从我口袋里拿出七角錢雇了一个挑夫，两个人把我抬进伪宜良鉄路医院。誰知医院里也是冷清清的，四处黑漆漆的。守門的袁大伯告訴我們，伪院长进城里打麻将去了，我只好躺在手术台上等他回来。血还在流着，伤口刺心的痛，想到往后的生活，我不由得涌出了泪水。

伪宜良鉄路医院設備十分簡陋。所謂手术台，无非是几片木板拼成的，枕头还是几块土基础成的。这里只有一个不学无术的“医生”当“院长”。晚上十二点过了，他

才从城里回来。他一进手术室，扭开电灯，满脸怒气，很不高兴地說：“三更半夜，怪讨厌的。”他跑过来拿起我的断手随便瞧了一下，就对护士命令：“做手术！”这个伪院长既不消毒，也不打麻醉，拿起锯子就锯。我痛得浑身麻木，虚汗直淌，有气无力地喊叫。他边锯边罵我：“叫什么，死不掉。”后来我就昏了过去。

伪院长馬馬虎虎把我的臂骨锯掉，就睡觉去了，将我丢在手术台上，不給我喝一口水，也不拿床被子給我盖着。我苏醒过来后，屋里黑洞洞的，又冷又餓，气忿极了。这些家伙，真是沒有把我当人看！好容易熬到天亮，我正想找护士，請她給点水喝。不料这时伪院长怒冲冲进来，恶狠狠地說：“我这里不住人，你自己找店子住！”我憤怒地回答：“我沒有錢住店子，你們把我抬出去丢掉好了！”我想，你莫非将我拖走！誰知伪院长果然叫来两个人，不由分說，把我抬出医院，一直抬到医院背后的一个猪厩里，把我丢下！我因为流血过多，身体十分虛弱，連掙扎的力气都沒有。在旧社会，我們工人不如一条狗，反动派什么狠心的事都干得出来！

我躺在猪厩里，白天任凭太阳晒，晚上任凭冷风吹。整整两天两夜，口里渴，肚里餓，伤口痛，只剩奄奄一息。到了第三天，我老婆才聞訊从开远赶到宜良来。她一見我手断了，人也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扑在我身上就放声

大哭。哭了一陣，她才赶快找东西給我吃，找水給我喝，然后到段上找伪段长，請求給个住处养伤。可是伪段长理都不理，只說了一声：“我們不管这些，你自己想办法。”就把我老婆赶了出来。她只得到站上找些烂木板来挡风遮太阳，到山上割些茅草来垫，暂时在猪厩里住下来。

第二天，我老婆扶着我到医院換药，我們就在靠墙的凳子坐下。伪院长一見就喊：“起来起来，不干不淨的，我們难得打扫。”我們只得站着等。后来一个护士把我的伤口冲洗一下，又包扎起来，就叫我走。

宜良的鉄路工人知道了我的悲惨遭遇，个个十分憤怒。晚上下班后，六十多个工人集合在伪鉄路医院門前。不料医院里冲出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反动軍警，为首的伪軍官对着工人恶狠狠地說：“有什么問題提出来好商量，为什么无理取鬧？”工人紛紛憤怒地揭露伪院长的罪行，要求把我的伤口医好。伪軍官看見工人越来越多，个个摩拳擦掌，只好連声答：“一定向院长轉达。”工人才憤憤地分散回家。

晚上，伪院长和伪軍官来找我，問我：“是誰带头聚众鬧事？你要老老实实說。”接着伪院长又威胁道，“你的手术費、医药費一共二百多元。如果你說出来了，就不向你要了，如果你不說，你就休想离开宜良。”我哪里能恩将仇报；再說，我确实也不知道事情的底細，我冷冷地反問：“你們把我整得走都走不动，我怎么知道是誰聚众鬧事？”

他們一再追問，見我一言不發，也就挾着尾巴溜走了。

第二天，我們就悄悄地乘火車離開宜良回開遠，因為怕這些壞蛋懷恨在心，對我下毒手。

回開遠後又醫治了二十多天，傷口還沒有完全好，偽段長就到我家裏來，對我說：“你再不上班干活，我就把你開革了。”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只好帶傷上班。偽段長派我到水泵房看水泵，逼我一個人干晝夜三個班。

解放前我們給官僚資本家當牛馬，如果不幸因工受傷，就算你倒霉。反動派只要你干活，病死傷殘，他是不管的。不論輕傷或重傷，醫藥費一律自理，治傷期間，完全不給工資，沒有把你開除，就算是對你很客氣了。我這次手被輾斷，醫藥費全部從我的工資中扣除，前後兩三年才扣清。

這次斷手，流血過多，後來因為生活困難，身體得不到調養，體質就一天天弱下去，常常全身關節酸痛，有時候甚至手脚麻木，躺下去就爬不起來。但是為了活命，我還是掙扎着給反動派當牛馬。

解放後，黨醫好了我從舊社會帶來的殘疾，安排我做輕便工作，對我的照顧真是無微不至。現在我們一家人過着幸福生活。在新社會黨十分關心工人的安全生產，萬一發生工傷，可以免費醫療，工資照發，這些現在看來似乎是很平常的，可是在過去，我們做夢都想不到！

黃安邦 整理

父 亲 的 死

昆明机床厂工人 刘金顺

我原来叫石白顺，1946年改叫刘金顺，为什么呢？这里面有着一段辛酸的遭遇。

我的父亲名叫石朝，原在汉阳兵工厂工作，是一个有名的钳工，专做一些高级精度仪器的机械零件或是修理这些零件。

我在三岁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强占了我国东三省。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奸淫，无恶不作。蒋介石卖国贼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但不抵抗，反而一方面向日寇求和，出卖祖国和人民，一方面打着抗日的招牌，镇压人民抗日力量，无孔不入地搜刮民脂民膏，到处兵荒马乱，人民生活痛苦已极。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执行了背叛人民利益的投降政策，反动军队不战而退，日寇节节向祖国内地深入。国民党一方面逃命，一方面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就决定把伪中央机

器厂从上海搬到昆明。厂里需要的工人，有一部分是从汉阳兵工厂调来，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父亲不愿来，国民党反动派就说调着不来的都是共产党，要开除，要枪毙。那时到处是饥饿失业的景象，被开除就要失业，父亲只好含着眼泪带着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因厂房还没有盖好，我们一家住在同仁街，生活是很苦的。父亲每天工资一块钱，只能买三斤米，不够一家吃顿干饭。全家五口人，只有一床补得像筛子一样的被子，一床洗得一触就破的垫单，五个人合睡一张床。白天床上就铺起那条垫单，晚上把它收好，用四条麻袋垫着睡，真是穿衣无换洗，家无过夜米。

过了半年，老八联（宿舍名称）盖好了，我们才从同仁街搬到老八联。那个时候，整个山凹，除老八联外，都是一片荒野。

有一天父亲在工作时，见一个普通工，扛着六呎车床床身，脚踏的木板断了，眼看那个普通工就要被床身打死。父亲连忙丢掉工具，一个人抱着床身，救了那个普通工人的命。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在今天是要受到党和同志们的表扬和重视的。但在那个时候恰恰相反，只要工人的劳动力，而工人的生命，他们根本就不管。父亲在抱床身时，用力过猛，伤了腰部和肺部，两三天后，就不能起床，口吐鲜血，成天叫腰痛、胸口痛。父亲的朋友告诉我

媽媽，要趕緊給父親醫治。媽媽帶着我找到了反动主管，告訴他我父親因為工作時救了別人傷了身體，現在口吐鮮血，臥病不起，請他開個條子給我父親到醫院醫病，可是那個吃人的主管卻怎麼說呢？他說：

“走開！誰叫他去救人呢？我不管。要進醫院，醫院的門開着，你自己送他去！”母親听了，又氣又急，急的是自己身無分文，氣的是國民黨反动派喪盡天良。父親的病不醫，一天一天重下去，萬一有個好歹，以後的日子咋個過呢？我看着母親的臉，青一陣，白一陣，眼淚像泉水一樣涌流。這時，母親泣不成聲的說：

“主管，請你救救我們，我們一家人就靠他那雙手過活。”

“早就給你說了，誰叫他去救人，要醫你們自己去醫，醫院的門開着！”這個毫無人性的主管坐在皮椅上，逍遙自在的望着天花板說。

“主管，我們自己實在沒有辦法，還是請你開個條子給我們。”

“你們自己不會找別人借一點嗎？”

“到哪里去借呢？願意借錢給我們的，和我們一樣窮，哪里有錢借；有錢的人又不願意借給我們。”

“那我不管，還是你自己想辦法！”

好說也不行，硬說也不行，我母親實在無法，心一橫，

就气愤地说：“那好，你们不给我家石朝医病，石朝死了，我们一家人也要饿死。迟死不如早死！我就死在你面前！”不得已，他才开了一张在厂里医务室看病的条子。

我和妈妈把父亲扶到了医务室。在旧社会，不仅吃饭穿衣走路分穷人和富人，就是看病也不例外。好的总是富人享受。穷人呢？连一点起码的生活待遇都没有。当时，厂里有职员、工人共三千多，而医务室只有两个医生、三个护士，怎能做好三千多职工的医疗工作呢？不过，国民党反动派也确实不要太多的医生，工人病了，没有劳动力了，就叫你出厂，何必还要医呢？他们搞医务室，医生、护士都是为他们服务的。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开了一个条子，可是到医务室里，医生只给我父亲擦了一点碘酒就叫他回家，这怎么能医好父亲的病呢？

父亲到家里休息几天后，还是不好，进医院没有钱，再求主管也没有用，母亲十分着急。

过了一星期后，父亲的病还很重，不能走路，眼睛也不行了。本来他还应该休息，但是他心里明白，家里已经两三天没有米下锅，不能再休息了。万不得已，父亲弯着腰，走一步拖一步，到工厂去做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一个带着严重肺病、两眼昏花的病人怎能吃得消？虽然疾病已经夺去了他一半的生命力，为了糊口，他还是尽力每天干出比一个好人还多的活来，可是主管还是不满意。

“石朝，为什么做活闭着眼睛？”

“主管，我病还没有好，眼睛睜久了头会昏，但是我做的活也不比别人少。”

“胡说，放屁！你明天不要来上班，名牌我已拿掉了。”

“主管，不行呀！我一天做的活不比别人少！我以后再出力干，还是给我上班，我一家五口人就靠我。”父亲恳求着。

“不行！”

“主管……”

“说不行就是不行！”主管甩着文明棍边说边走了。父亲失业了。

父亲的失业，这对我们一家来说，就像一蓬花草碰到霜上加雪，雪上加霜，遭到致命的打击。我和母亲都围着父亲哭。为了生活，父亲还是硬着头皮去上班。走到工厂门口，他的名牌已经不在了。他再一次去找主管，得到的还是冷眼和恶骂。当天下午，反动派就通知我们搬家，不准住厂里的房子。

从此，我们开始了更悲惨的生活。父亲的学徒和朋友拼拼凑凑地搞了一点本钱，给父亲买副籬籬到龙街、花鱼沟卖松子和瓜子。我和母亲单衣薄衫，迎北风，踏霜雪，天不亮就起身，到十几里外的大哨、小哨找柴，挑到岗头村去卖，找一天卖一天，换不到五斤米。三个人苦一

天，还是不能糊口。我懂得吃不饱是因为失业，因为没有钱；两个弟弟不懂事，吃不饱就哭。有时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就假意叫我出去买东西给弟弟吃；等我回来，弟弟已经饿着肚子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父亲的病越来越重，眼睛红得像灯笼，咳嗽咳得更厉害，他实在不能支持，应当休息治疗。但是为了生活，他每天还是拖着沉重的步子，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一天比一天去得早，一次比一次回来得晚。

当时真是愈穷愈见鬼，愈冷愈刮风。我父亲到单身宿舍里找一位朋友。单身宿舍门口晒满了衣服，我父亲走到门口时脖子痒，就伸手抓脖子。反动的警卫队队长看见了，就说我父亲偷东西，不由分说的把我父亲抓到警卫队。到夜里我们不见父亲回家，问来问去才知道父亲被警卫抓去关着。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个到警卫队找刘大队长。开初那个吃人的刘队长说不在，我母亲说不在我们自己去找。在一间小茅房里，我们找到了父亲。他被四个警卫反臂捆着，绳子的一头拴在梁上，正在受毒刑。我们这才知道父亲被他们咬定是“偷”东西，要他承认“偷”了些什么。母亲急的哭。我说：“刘大队长，放了我父亲，我们一家人吃饭全靠他。”

母亲说：“刘大队长，请你放掉他吧！他带着病。”

阴险的刘大队长就讲：“石朝，看你的娃娃多懂事，

你还是讲了吧。小事情，只要你說你拿了些什么，我們就放你。”

“沒有，你要咋个办就咋个办！”

狡猾的刘大队长又轉过身来对我說：“小鬼你說吧！說了我們就把你父亲放掉！”

沒有的事，叫我咋个說呢？我說：“我爹不会偷东西！”

逼得我們沒有办法，最后，还是十几位老师傅出名才把我父亲保出来。

失业了七八个月，父亲經朋友介紹到伪中央无綫电厂。可是，天下老鴉一般黑，主管一見父亲就說：“不行！”

“为什么呢？”

“你是被中央机器厂开除的！”

“那是他們冤枉我的！”

“不管！”

还是父亲的朋友七說八說，主管才勉强答应了，但不能做长工，也不是做临时工，而是做包活。照当时預計的工錢，做一天活可以买七八斤米。父亲不要命的一天干到晚，一夜干到亮，想积一点錢到无活做时維持生活。但是事情恰恰相反，貪污腐敗的国民党时代，物价一天涨几十次，上午可以买包香烟的錢，下午就成了廢紙。父亲苦了一月总共只买了三十斤米。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了，這對千百萬勞苦大眾來說，是好事。但是在國民黨統治區，抗日勝利給人民帶來的是更大的災難。偽中央無線電廠全部解散，偽中央機器廠也解散，僅這兩個廠就有六千多工人失業，父親當然也就失業了。那時大家的生計十分貧困，賣松子和瓜子沒有人買，燒柴也賣不掉。沒有辦法，父親就帶着隨他幾十年的小起子和扳手到昆明市修鐘表。當時門面堂皇的大鐘表店別人也不大相信，何況父親是只帶着一把起子、一把扳手的“沒腳蟹”，人家怎麼能放心給他修鐘表。他整天在街上轉，這條街轉到那條街，一家一家的探望，看看牆上有沒有掛鐘，掛鐘是走着還是停着，要是停着的話，就問：“你家的鐘是壞了嗎？我來給你家修。”

“你是哪家鐘表店的？”

“我不是鐘表店的！”

“那你修什麼表呢？”

“我帶着工具就在你家修。”

“不行，把我的鐘修壞了！”

“試試看，修好再給錢，修不好就不給錢。”

就是這樣，父親天天清早出門到昆明街上去修鐘表，晚上十一二點、一兩點鐘才回來。每天傍晚，我們總是站在門口，朝着父親回來的路上盼望。有兩天弄到幾斤米錢，有更多的日子是餓着肚子去餓着肚子回來，一家人餓

着肚子过夜。

1946年夏天，父亲又經朋友介紹重进伪中央机器厂。这时，父亲大便解的是血，嘴里吐的是血，脸黄的像黄蜡一样，眼睛也看不清了。在厂里，他一个人单独在一处做工。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上班，路上有人問他：

“老石，不行啊！你还是休息休息再干。”

“那不行呀！我不上班，一家人就要挨餓！”

“我們想办法帮你！”

“不行！你們也和我一样。”

“这样下去把你拖垮了更不好。”

“到那个时候再讲！”父亲搖着头，一陣咳嗽。

一天，父亲下班回来，走到門口就跌倒了，我和母亲赶快将他扶到床上。他从此就再也起不来了。他呼吸就像拉风箱一样，下巴、脖子都烂了。睡了两天，他想吃肉。他不提我們还想不起来，他一提，我們記起已經一年多沒有吃肉，几个月炒菜沒有放油了。母亲跑了七、八家邻居才借到一斤肉錢。肉买回来煮烂了抬到父亲面前，他吃不下去了。他嘴巴不灵，呼吸也很困难了。他望着摆在面前的肉，再望望母亲和我們几兄弟，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吃力地說：“白順，你們几个要記住这仇恨呀，长大了好好的做人！”然后又对母亲說：“你要想办法将几个孩子撫养大。回家也好，在这里也好，心里不要老只是想着我，要坚强

地活下去！……”話未說完，父親就死去了。

父親死后，家里一文錢也沒有。母親帶着我和弟弟去找反動的廠長。哪知到了他家門口，他家里正在花天酒地的過周末，還請了舞女，陪那些科長以上的職員跳舞。等了好半天，我們才見到反動廠長。我母親說：“廠長，我家石朝死了，他是為廠勞累死的，請廠里給點喪葬費。”他却愛理不理的說：“死了你們自己去埋，還要什麼喪葬費！”我



母親再三的求他，他就擺出猙獰的面孔說：“找人事科長去！”到了人事科，科長拿出一個厚紙夾，翻出一張巴掌

大的紙条說：“看！这是石朝入厂时写的保証书，上面明明写着病死伤残自己負責。”最后，还是老工人发揚了階級友爱的精神，帶着我东家捐点，西家湊点，給父亲做了个极薄的棺材，把父亲的尸体埋葬掉。父亲是个有着丰富經驗的鉗工，可是在旧社会里，他既不能养活妻儿，連他自己也养活不了；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折磨死了，連埋葬他的錢都沒有。誰給他安排的这样一个命运呢？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是吃人的資本主义制度。

父亲死后七八天，我母亲又生第三个弟弟。那时我們什么也不懂，母亲自己为自己接生。本来生产后，要吃好一点，但是我們一家連飯都吃不上，哪里来好的吃啊！母亲餓着肚子睡了三天。邻居看到这样的情况，就劝我母亲把刚生下的弟弟卖给沒有孩子的人去养。自己的骨肉怎么舍得呢！母亲不答应。可是，她想到父亲是一个有技术的工人，也沒法养活一家五口，自己是一个家庭妇女，哪能維持一家衣食。沒有办法，母亲含着眼泪，把刚生下的弟弟卖給了別家人养。卖得三万元伪币，吃几天干飯就沒有了。为了找个依靠，把我們弟兄三个撫养大，母亲經人介紹改嫁。现在的父亲叫刘炳章，我就改名叫刘金順了。刘炳章也是个技术工人，他也和我生身父亲一样，不能养活我們兄弟三个，我和二弟还是像以往一样，找柴，拾谷子、烟头来維持生活。

解放了，党和毛主席的光輝照到了穷苦人身上，我們一家人得到了幸福的生活。我和二弟进了厂，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現在已經是个四級鑄造工人。我的弟弟刘金生是个四級电工，我现在的父亲是个六級技工。我和弟弟都結了婚，有了孩子，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要是我父亲活到现在，那么，他的辛勤劳动和丰富的技术經驗，肯定要受到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重視。

今后，我要更好的遵照党的指示，为实现更美好的、更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彭炳成 整理

陈蜀堯 插图

到处受折磨

以礼河安装工程队工人 關錫盛

我一想起旧社会受的苦，就整夜不能合眼。在解放前，我从农村逃到城市，从工厂逃到矿山，到处受折磨，直到解放后，打垮了反动派，我才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的老家在山东。自从六岁那年母亲死后，父亲领着我和哥哥，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为了活命，我十三岁就给地主当小长工。每天给地主家挑水、喂马、烧火、哄孩子、喂猪。后来，还要干地里的各种轻重活。地主的姨太太一天打我两三回。干一年才给一千五百文钱，七除八扣，到年底，一个钱也拿不到手。

十六岁那年，父亲又死了，哥哥逃到外地谋生，我成了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我想，给地主干活，一辈子都是白干；不如跑到关外投奔我叔叔，在那里能找个工作，或许比当长工强些。有一天晚上，我就悄悄地逃出了地主家。

我流浪了一年多，受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大連。在大連我四处寻問，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叔叔閻理田。我很高兴，在人地生疏的关外，总算有个亲人。誰知道他是个把头，又是日本鬼子的走狗。那时他正領着一帮人盖一幢三层大楼，我就在他手下当个小工。我們从早到晚抬着百把斤重的沙石来回爬上三层楼。当时，我年紀还小，爬上第三层楼时，心就突突地跳。两腿直打哆嗦。他見我們停一下，就像狗一样嗥叫：“快点走！”晚上回家，还得当他的奴僕。

日本鬼子一天給我們三角工錢，他要抽三分。我們不得在街上买东西，要什么就向他买。一盒香烟外面卖三分，他卖四分。一双胶鞋外面卖八角，他卖一元。发工資时，他对我說：“錢放在叔叔这里，要用再来拿好了。”我掙下的一点血汗錢，全进了他的腰包。

不久，我病了。我要点飯吃，他不給，他說：“害病了，还能吃飯？”我一再央求道：“叔叔，給我点飯吃。”他橫眉瞪眼地对我說：“什么叔叔，一天三分錢比亲儿子还好！”再过几天，他竟叫我“滾蛋”！他还对我說：“我这里不是养老院！”这个六亲不认的日本鬼子走狗，眼中只見三分錢！我是个硬汉子，当天就走了。

我跑到干井子的一个煤矿找到了一个打炮眼的工作。資本家給我一根一时二粗的釘子，一把十四磅大錘，告訴

我打进一尺深給一角工錢。一天累得半死，虎口都震裂了，才得兩三角錢。每天吃点包谷稀飯，碗上糊滿蒼蠅，張口一喝稀飯，蒼蠅就往肚里咽。住的是兩層草席子搭成的窩棚，地上鋪的是自己從山上弄來的茅草。每天晚上進窩棚，跳蚤就糊滿腿，咬得你一夜睡不着覺。到了冬天，北風夾着雪花從席縫里吹進來，冷得如鋼針刺骨。大家沒有鋪蓋，只好兩個人互相用棉衣包着腳睡覺。半夜里，實在凍得不行了，就起來跑跑。

我在這個礦山干了一年，資本家不給我一個錢的工資，還不准我走。這種日子比給地主干活還要苦，我就冒險逃跑了。

我跑回大連，哪里也找不到活干，整天在街頭流浪。有一天，瓦房店煤窯的一個招工把頭來大連招工。他大吹大擂說：“活兒不重，每月十五元，一天一頓白面。哪個願意去，先借給十元，買買東西就走。”我正在走投無路，就和幾十個失業工人報了名。我們向他要十元買點東西，他說：“一起到火車站上發。”我們到了火車站，他又說：“大家先進車廂里再說。”我們進入車廂，把頭馬上把車門關上，“卡嚓”一聲上了鎖。凶惡的資本家就這樣把我們騙上火車，一直開到瓦房店煤窯。

瓦房店煤礦真是個人間地獄。礦井里面大洞分支洞，支洞又分小洞，洞里昏昏暗暗。我們每人一把鎬，一盞瓦

斯灯，一个麻袋，不分昼夜地干活。工人从头到脚都是煤灰，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吃饭时就连煤灰一起吃进肚里。每个洞口堆一些沙土袋，洞里出水或瓦斯爆炸时，不管洞里工人死活，就用这些沙土袋将洞口堵死。我到那里不久，就发生一次悲惨事故：一个支洞突然塌方，资本家不但不设法救人，反而把几百个工人完全堵死在洞里！在这里干活，天天都有丧命的危险。明说一天五角钱，我干了半年，还不見发一角钱的工资。

从前东北流行一句话：“到了千斤寨（撫順煤矿），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到瓦房店的工人遭遇也一样。我先卖衣服，后卖铺盖，最后除了一个晚上盖的麻袋外，一无所有。我忍无可忍，又再逃跑回大连。

我在大连街上卖零工，两天吃三顿，经常饿肚子。这年冬天，我们几个失业的穷弟兄，找到了一个打洋灰的临时工作。数九寒天，大雪纷飞，衣服单薄，就用装洋灰的纸袋子把头 and 身子包起来挡风雪。日本鬼子看见了，就用洋鎗没头没脑地毒打。有一次，我从工地上拾几颗钉子，想拿回去钉一下破窝棚。不料走出工地大门时，被日本鬼子搜出来，把我抓去毒打、灌辣椒水，折磨得半死，才把我赶出来。我又失业了。

在大连找不到工作，实在活不下去了，听说盐家岗要人，我就跑到盐家岗。招工把头将我派到一个修路队给日本



鬼子修铁路路基。这里，外面有电网，里面有铁刺网，四面有炮楼，出入只有一个大门，到处有日本兵巡逻。

我们像囚犯一样，前后有监工的皮鞭，远处有日本鬼子的狼狗，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我想，在这个鬼地方，这回算完蛋了。每天，都有几个工人被日本鬼子的狼狗咬死。工人病了，几天不出工，就拖出去丢在山坡下喂豺狗。我干了七、八个月，还不見发工资。有一天，我就問工头：“先生，什么时候开工錢？”工头瞪起眼睛說：

“你发昏了，你们给卖了，一个人五十元，还要什么工钱？”我吃了一惊，心想，只有逃走才是生路。

在一个阴雨的晚上，乘交接班大家都比较忙乱的机会，我约了五个工人，悄悄地往外爬。我们很快就爬出铁刺网。不幸，在通过电网时，前面两个人触电死了，我们后面三个人就找了几根木棍，把电网撬起来，这才逃出电网，心里高兴极了。有一个弟兄急忙往前走。外面草很深，一走就有响声，被狼狗听见了。日本鬼子发现情况，拼命打机关枪，还放出狼狗来追我们，前面这个弟兄就活活被狼狗咬死了。剩下我们两个，没命地跑。只听见后面一阵阵枪声。我们在高粱地里躲了三天才敢出来。

我逃出虎口，又跑回大连，在大连卖零工，当苦力，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

1948年，大连解放了，工人翻身了。我进了工厂，永远不再失业，永远不再挨打受骂了。我同所有的工人弟兄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十多年来，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从来不讲价钱。我在旧社会吃过那么多的苦，今天生活是这样幸福，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我只想多做点工作，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出点力量。

范书孝 整理

于 践 插图

徒工的血泪

昆明机床厂車間副主任 汪向葵

我今年四十四岁了，在旧社会整整熬了三十年。解放后，我才逃出了苦海，见到了太阳，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经过党长期的培养教育，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在旧社会当徒工的血泪生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十九岁那年，我冒着生命的危险，从国民党常备队逃出来，流落在昆明。我到处奔跑，一直没有找到个安身的地方。就在这绝望的时刻，听到伪中央机器厂技工训练班招考学徒的消息，使我格外高兴。通过朋友的介绍，请了保人，好不容易才进入技训班。

五百多名学徒集合好了。一个肥头大耳的中校反动军官，身穿一套笔挺的军服，腰间挂着亮闪闪的佩剑，大摇大摆地走上讲台，横眉瞪眼，拉长脖子对我们“训话”：“在生产实习之前，你们要集中受三个月的军训，每天三操两

讲堂。在训练期间，一律军事化，谁不听指挥，就按军纪办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叫杨丕明，是国民党派来的军训教官。

人人都说反动军队的生活苦，我们的军训生活要苦十倍！我们吃生虫的老仓米，住破房子，冬天穿两件单衣，每天还要三操两讲。那时我们住在厂区北门外，早上天没亮就起床，跑步到两里外的黑龙潭洗脸。回厂后，在操场上就是一二一的忽儿齐步，忽儿跑步，忽儿又是正步，累得腰酸腿痛。此外，每天还有背土基、抬石头、修马路、盖房子等沉重的苦役。抬石头不发给工具，要我们用肩头扛，几天就把衣服磨通了，肩头磨破了。说到背土基，简直是活受罪。我们用板凳背，低着头，弯着腰，从打铁车间小跑到北门外，两手麻木了，背脊骨磨出血，还不准休息。每天背五趟，少了要受处罚。晚上，脊背血淋淋的不能落床，只好侧着身子睡，浑身疼得像针扎一样难过。

有一天早晨，操场上显得与往常不一样，在操场的中间放了一堆柴棍。心想，这个家伙又要搞什么鬼名堂。早操开始了，教官在操场上鬼声鬼气的喊着口令，突然来个“左转弯走！”大家都没有注意，队形不整齐。教官就顺手拿起柴棍，从排头打到排尾，一根打断了再拿一根。以后，我们一看到操场上有柴棍，就背着教官把它拿走。但是，当这个反动教官兽性发作的时候，他使用了更毒辣的

手段。有一次操“齐步走！”“跪下！”因为时间操长了，大家都没有力气，动作不整齐，教官便拔出佩剑，命令全体伸出双手，他又狠狠地从排头打到排尾。这叫做集体处罚。

除了集体处罚外，个人处罚那就更多了，轻则一拳或是一个耳光，重则将屁股打得皮开肉绽。有一次操“卧倒”时，王庭板的腿没有伸直，教官走过来照准他的小腿踢了两脚，痛得王庭板差点哭出声来。又有一次，两个徒工吵架，教官就将队伍集合起来，当众用扁担将他们的手指打炸了。就在这时，张兴家冲口而出骂了一句，教官把张兴家拖出来就打，还命令我帮他按着。我哪里忍心，就气愤地叫了一声，“我不按！”我的话音刚落，教官一扁担就朝我打来。张兴家被教官打得皮开肉绽，全班同学都低着头，满胸的仇恨。

军训期间如果生病，就更惨了。有一个徒工叫陈家兴，一连几天拉肚子，还不准休息。一天上早操时，他向教官请假上厕所，教官破口大骂：“真是懒牛懒马屎尿多，早不拉迟不拉，偏偏现在拉！不准！”结果，陈家兴把屎拉在裤裆里，又被这个反动教官打得半死。后来陈家兴的病加重了，先后拖了一个多月。

那时还规定，三分钟起床、三分钟集合、三分钟吃饭。这是多么苛刻的反动制度！有好多个学徒在三分钟内没有

吃飽飯就被趕出食堂。有好多學徒三分鐘內起不了床，趕不上集合，被打得遍身青腫。有一天晚上，突然緊急集合。一個徒工因為白天勞累過度，起床超過了三分鐘，不敢出去集合，便光着身子躲到床下，不幸沒有躲過教官的那雙狗眼。教官走到床前，雙手抱住他的右腳拼命往外拖，這個徒工被拖得渾身鮮血淋淋的，大家看到了，沒有一個不流下眼淚。

誰都是娘生母親養的，這樣牛馬式的教育，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了。有一天，這個反動教官來當值，一個同學就將值日牌上“楊丕明”的“丕”字，抹了下面一橫，便成了“楊不明”。他看見了，氣得他臉青一陣、紫一陣。他獸性大發，馬上緊急集合，把值日牌摔在地上，大聲問：“是誰搞的？！”誰也不願說出自己同伴的姓名，大家都不吭聲。楊丕明急得兩眼發紅，叫吼着說：“你們都不承認，全體處罰！”他握緊手中的竹棍，使勁地從排頭打到排尾，打得有的手上流血，有的紅腫得像個饅頭。

但是我們誰也沒有屈服。大家實在忍無可忍了，就約定決心把這個反動教官攆掉（杀掉），各人逃跑，另找出路。有一天下午，天快黑了，有的同學帶上小鋸頭，有的同學帶上磨好的三角括刀，三三兩兩走向楊丕明住的地方。進了屋裡，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窗口上，有的蹲在門口，把這個傢伙團團圍在中央。他看到事情不妙，就

借故有事，偷偷地从后门溜走了。

熬过了三个月的军训，反动派把我们赶下车间跟锻工师傅学打铁，这才算是学手艺的开始。在旧社会，老工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多半不肯将技术教给徒工。当徒弟的要学到一点真本事是极不容易的。我的师傅知道我为一时学不到技术而感到纳闷，他便沉痛、坦率的对我说：“小汪，我们都是受苦的人，我怎么不想把技术教给你们呢；只是工厂里为了赚钱，不管老工人的死活，我把技术教给了你们，我的饭碗就保不住了！”我才深深地认识到“教好徒弟，饿死师傅”这句话，道出了老一辈工人内心的痛苦。

在旧社会，我在实习工场没有学到什么技术，但是受尽了资本家的折磨。有一次我学牛头刨床，师傅先给我校正好生活，让我瞧着做。不一会，工厂主任来到我眼前，斜着三角眼瞧了又瞧，接着问：“为什么把生活刨斜？”不分青红皂白，几脚把我踢到机器后面。这不是遭冤枉吗？我举起拳头，重重的给他两拳。大家赶上前来，才把我拉开。他立即摇电话找来了保厂队，把我抓起来。我想，我不能白白地受冤枉呀，就连夜逃跑。不料刚到警卫队门口，又被门警抓起来。他们要我写反省，我说：“生活刨斜了不是我的责任，我不写！”这些家伙就强迫我干了两个礼拜的苦工，扫一个礼拜的厕所，最后又派教官监视着我拔草。我

的手都磨破了，他們还下毒手，假意为我上药，用暴石灰粉塗在我的手上，疼得我直发抖。这次我被他們折磨了整整三个礼拜。

那时候資本家根本不管工人的生命和安全，工場里没有什么劳动保护設備，多少工人兄弟因此丧了命。有一次我做鏢床，被电触伤昏死在地上，同學們去告訴領班，領班不但不管，反而說我装死偷懶。又一次我在鉚焊厂工作着，忽然听到一声巨响，接着又是連声惨叫。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姓张的同學倒在地上。只見他兩脚蹬着，兩只手不住的在地上乱抓，忽儿又紧紧的抱住头。我急忙跑过去扶着他，但是他已不能站立，臉全烧焦了，嘴皮在顫抖着，兩只明亮的眼珠变成两个漆黑的洞洞。我細看他的眼窩，好像里面有个什么东西似的，就用手指从他眼里取出指甲大的兩片硬东西。仔細一看，才知道他浇鑄合金“房耳”时，被鉄水炸伤了。工人兄弟們都围攏来了，大家看到这般情景，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有的工人跑去告訴伪厂长，好半天他才像散步似的懶洋洋地走到跟前，对着大家說：“你們围在这里干什么？快去干活！”工人兄弟們气忿地叫了起来：“人都炸死了……”还没等我們說完，伪厂长就搶着說：“抬到医务室去，其他的各人干各人的活，快去！”他兩只眼珠被烧焦了，那里还能医好？可怜他年紀輕輕的就被資本家夺去了双眼。不久，他伤还没有医

好，就被开除出厂了。

我当了三年徒工，不知流了多少血泪！当然，过去的悲惨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在幸福的今天，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过去。

李显宗 整理

从流浪儿到工程师

云南印染厂彝族工人工程师 戴仁理

抓丁逼债 家破人亡

我生长在昆明附近的一个彝族农民家庭。原先我有六个兄弟姊妹，一家八个人热热闹闹的。后来反动派把我家害得死的死、逃的逃，家破人亡。

我五岁那年，妹妹害重病；因为没有钱医治，一家人眼睁睁地望着她死去。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揩干，保长就带着一群匪兵闯进我家，把我那十六岁的哥哥抓去当兵。从此，父亲失去了一个帮手，家庭失去了一根顶柱。父亲整天唉声叹气，母亲天天晚上都要哭一台。

那时，只有大姐比较懂事，能替父母亲分担忧愁。她不但帮助母亲做家务事，还上山、下地帮助父亲干活。不上半年，面黄肌瘦的大姐就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为了救活大姐，父亲只好忍痛向姓那的地主借了六斗米的钱，给

大姐治病。大姐知道了，有气无力地对母亲说：“阿媽：借不得，閻王債！死了，就算了。”说罢，眼泪朝枕边淌。母亲看看奄奄一息的大姐，想起这笔六斗米的閻王債，也由不得伤心痛哭起来。

几天后，大姐的病情稍有好轉。誰知同院的七八家人，听信“师娘”的胡言乱語，在一家富农的慫恿下，竟强迫我家将身患重病的大姐从家里抬出去。万不得已，父亲将大姐背到猪厩里。沒有几天，大姐就死在猪厩。

大姐死后，地主三天两头来逼債。父亲走投无路，就悄悄地逃走。狼心狗肺的地主，比虎豹还毒。父亲走后，他就逼我二姐到他家当了头。因为天天挨打，后来二姐就逃跑到昆明帮人。从此，我們就不知道二姐的下落。可是地主还不死心，第二年，他又逼我去給他家放牛。在旧社会，穷人有苦无处訴，有冤无处伸。穷人好比地主砧上的肉，任他宰来任他割。母亲虽然万分气憤，也只得含着眼泪，牵着弟弟，送我到地主家当放牛娃。

到处流浪 受尽折磨

在地主家，每天早上，我拿了两个苦荞粑粑，赶着一群牛上山放牧，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睡在牛厩里。一年四季赤着双脚，身上披着几片烂麻布。地主只想剝削，那管你冻死或餓死。冬天，又冷又餓，我只好伏在牛背上

取暖。不到半年，地主把我折磨得又瘦又黑，手脚像四根枯树枝。

有一天，刮着北风，天气十分寒冷，地主还是迫着我到山上放牛。到了山上，我照样伏在牛背上取暖。不料牛冷得乱跳，把我甩了下来。我从山坡上往下滚到箐沟，胸膛被树桩戳了一个大洞，鲜血直冒。我用手捂着伤口，忍



痛把牛赶回去。过了几天，伤口发炎，胸部浮肿。地主见我不能再为他家放牛了，就把我撵回家。

我回到家中，母亲见我被折磨得不像个人样，抚摸着

我那浮肿生蛆的胸口，辛酸的泪水簌簌地落了下来。后来是村里的一位老大爹，用一些草药将我的伤口医好。

九岁那年，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轰炸昆明。城里的许多“老爷”、“太太”都到乡下躲飞机。有一天，一个姓陈的戏院老板到我们村里来。他看到我家三个人穷得无衣无食，就问我母亲，愿不愿意让我跟他到昆明学唱戏。在旧社会，都说学唱戏是“丑事”，因为我家穷，顾不得好丑，母亲还是让我跟着老板上昆明。

到陈老板家，每天给老板娘煮饭、倒痰盂、领孩子。老板娘稍不顺心，就拿我出气。半年后，老板叫我跟他学翻斤斗。我的动作有点不对，他就劈头打我一棍子。我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红一块。有一次，老板教我做一个比较难做的动作，我一连几次都做不好。最后再做一次，把腰杆损伤了，爬都爬不起来。残暴的老板，性如烈火。他拿起棍子就往我背上乱抽，嘴里还大声对我辱骂：“他妈的！不成器！”我痛得在地上乱滚，他还不住手。后来，他把棍子打断了，才悻悻而去。因为腰部受了伤，不能再给老板干重活了，老板就把我赶了出来。

不久，我表哥介绍我到昆明“民众浴室”当小工，换几口饭吃，没得工资。这家浴室的老板是个狡猾的大流氓。他对我端详了一番，见我又瘦又黑，就沉下脸来，对我表哥说：“长得黑漆漆的，看了逗人厌，不好做生意！”我表哥

一再苦苦哀求，他才轉口說：“好吧，先在半年，如果臉不變白點，就怪不得我了。”我聽到這些侮辱人的話，又傷心，又氣忿。半年後，因為長期在室內勞動，我的臉色當然慢慢變白了，這才被留了下來。

在浴室當小工，每天六點鐘就得起來生爐子燒開水，然後就是洗茶杯、挑水、掃地、倒痰盂，直到晚上十二點後才能休息。後來我又學會了擦背、捶腿。我在兩年，老板還是不給我一文工錢，連衣衫都不給我買一件。那些有錢人洗完澡，有時把髒衣衫丟下，我就撿來穿。老板欺侮我是少數民族的苦孩子，叫我干最髒最累的活，給我吃最差的菜，還經常把我打得鼻青臉腫。那時我年紀小，每次挨打，只有把眼淚往肚里吞，把仇恨記下來。

最痛苦的是侍候那些國民黨軍官、“老爺”、流氓等，他們常常任意揮拳把我們沐浴工人打得半死。有一次，一個國民黨軍官來洗澡。我給他送茶，一時不小心，我的腳把他的皮鞋弄髒了一小點。我連忙脫下衣衫給他擦乾淨，又向他賠不是。我剛返身要走，他騰地站起來，罵聲“他媽的”，拍拍就給我兩個耳光，又一腳把我踢倒在地上。老板為了討好這個壞蛋，拿來一根扁擔，就朝我頭上、背上毒打。我爬到床底下去，他又把我拖出來打；我跑到澡堂，他追到澡堂打。這次，我被老板打得遍體鱗傷。以後，每逢天陰下雨，我的頭、胸、腰就痛得要命。

我在“民众浴室”当了三年小工，受尽了老板的打、罵和侮辱，沒有得过一文工錢，却得了一身的疾病。第三年的冬天，我終于病倒了。老板就一脚把我踢了出去。

世上的大路小路有千万条，却沒有一条我們穷人的活路。我想找工作，沒有人要我；回家呢，母亲是那样苦，再說，也沒有車費；找表哥，他也是家貧如洗。眼前只有一条絕路：当叫花子。当叫花子我还少一个破碗！

从此，我朝朝暮暮流浪在昆明街头，伸着一根枯瘦的小手，要点残湯剩菜充饥。晚上，就在光华街一带，宿街倒巷。有多少寒冷的晚上，我冷得縮成一团，躺在黑暗的屋檐下过夜。狗有一个窝，我連个窝都沒得！

1947年，我有十三岁，裕滇紗厂招收童工。我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向表哥借了一件干净的衣衫去参加考試。

監工問的，我都用流利的汉話回答了。最后，監工問我：

“你可是个保保？”我心中一惊，可是我馬上就回答：“先生，我是汉族。”我不敢实說是彝族。在昆明流浪了四五年，我知道讲实話一定进不去，进去了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侮辱。这次有二十几个彝族青年报名，只有我們三个冒充汉族、能讲流利的汉話的苦孩子被录取，其他都落选了。

进厂后，監工把我分在搖紗科拣筒管。解放前，車間里根本沒有什么通风、降溫、除尘設備。为了降低車間溫度，减少断头，地上整天泡着水。許多女工长期站在水中

劳动，都因此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和妇科病。我整天钻到机器下面，在水中捞筒管，从早到晚衣服湿淋淋的，身上冷得直发抖，手脚冻得又肿又麻。在旧社会，莫说冻得手脚麻木，就是冻死了，资本家也不管。

“童工苦又难，天天泪汪汪”。三餐吃的是霉米饭，冬天只穿两件单衣。这且不說，在車間里，还要經常挨监工打罵。筒管拣慢点，或者站着伸个腰，都要挨几个耳光。有一次，我被小車子冲倒在地上，左脚的螺絲骨被冲得凹了下去，倒在地上爬不起来。监工看見了，恶狠狠地踢我两脚，罵我“笨蛋”。当了三年童工，不知挨了几百次打罵！

我在紗厂干了三年，还是像过去一样痛苦。为什么我的遭遇这样惨呢？过去我只怪我命苦，怪家庭貧寒。后来，一个地下党的同志了解了我的遭遇，很同情我。她常常对我讲一些革命道理，我的認識才慢慢提高，我就积极参加了罢工，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迎接解放。

换了人間 长大成人

解放后，流浪异乡十多年的父亲和被反动派抓去当兵的哥哥都回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們村里的各族人民斗垮了地主，分了田地。我們一家人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1950年，党送我到工人训练班学习文化。1952年，党

又送我到上海学习机械印花。当我接到通知时，我感动得一双眼睛涌满了眼泪。到上海学技术，在旧社会，我这个要饭的流浪儿做梦也不敢想！

在上海，党请教员给我补习文化，请最有经验的老师傅教我印花技术。那时我身体比较衰弱，党就照顾我吃富有营养的饭菜，安排我住在四层高楼上的一间舒适的房间。党比我亲爹娘还要好十倍！

旧社会将我摧残得遍身是病，特别是关节炎、高血压和淋巴腺炎尤为严重。有一次，我身上的几种病同时并发，党立刻把我送进上海最好的医院抢救。经过一个时期的治疗，几种病基本上都治好了。这次住院所开支的医药费不下千元，全部由国家负担，我个人不花分文。在旧社会，工人生病只有等死。1948年，我在裕滇纱厂时，患了急性盲肠炎，痛得在地上打滚，资本家根本不管我的死活。几个工友看我痛得实在可怜，把我抬进医院。这次我在医院住了十天，资本家扣了我的半年多工资。

1955年底我从上海回来，党把我调到云南印染厂工作。经过党长期的培养和教育，我的政治觉悟不断地提高。1956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个成员。从此，我就更加自觉、积极地劳动。

1957年，领导上决定生产民族花布，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十分激动。在旧社会，我们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都是

穿一件破麻布衣衫，沒有見哪个穿过花布，而印有民族花紋的花布更是从来沒有見過。我暗下决心，决不能辜負党的培养。后来，在党的鼓舞和帮助下，我和工人同志們进行了三百多次的試驗，終于成功地印出了美丽的民族花布。

当我在劳动中做出一点成績时，党和人民就給我很高的荣誉。我曾多次被評为省、市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过全国青年建設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全国群英会，我还在天安門面前参加过观礼。1958年，党把我这个旧社会的流浪儿提拔为技术員，1961年又提拔为印花工程师，让我担負技术领导工作。在旧社会，因为我是个少数民族的苦孩子，受到反动派的歧視和侮辱，終于流浪街头，当叫花子；在新社会，党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这个少数民族的苦孩子，让我讀書識字、把我培养成为一个紅色的工程师。所以，我万分仇恨旧社会，我万分热爱新社会。

我每次回家探望母亲，村里的亲人总爱說：“彝家的苦孩子当工程师，还到北京开会！开天辟地沒有見過！”真是这样，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这个彝家的流浪儿才能成为一个人民的工程师。

文紀律 整理

賀惠賢 插图

忆苦更知今日甜

昆明机床厂工人 赵学全

我家原在昆明书林街，父亲是个做小生意的摊贩。那时我有个哥哥、有个妹妹，一家五口人就靠父亲每天挣来的一点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一天挣不着钱，一天就要挨饿。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的飞机成天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扫射轰炸。1941年我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毁了，逼得我们一家人到处流浪，最后在东站搭了一个小窝棚住下来。父亲每天到街上帮人挑扁担，我和母亲到车站上拣点小炭核来卖。一家老小，从早到晚奔波劳累，还苦不得一顿饱饭吃。有时我和妹妹饿了，就到处去拣些人家削掉的洋芋皮来充饥。

在旧社会，我没有读过一天书。看到有钱人家的子女背着书包去读书，心里很羡慕。心想：要是那天我也得去读书那该多好啊！可是一直没有实现我的愿望。那时穷人

家的孩子連飯都吃不上，那里還有錢去讀書呢。

在舊社會，常聽人說：“天干三年，餓不死手藝人。”我想，能學點手藝，就不會挨餓了。1946年，我剛滿十三歲，就到昆明青雲街一家皮鞋店里當學徒。可是，到了老板家，哪里有技術給你學？整天就是幫他家領娃娃、掃地、倒馬桶；家里的事干完了，又叫敲彎釘子，從早苦到晚還要經常挨老板打。有一次生了病，釘子敲得少一些，就被老板狠狠地打了一個耳光。他說：“你敲這几顆釘子，還不够老子家的飯錢！”以後，我只得拖着病干活，不敢怠慢。老板是個賭鬼，每天晚上都要賭到深夜才回來。有一天晚上將近半夜了，他才來喊門，我開門稍為遲了一點，他就朝我肚子狠狠地踢了一腳，還罵我：“小雜種，老子喊門你都不來開，好大膽子！”在他家學皮匠，半點技術沒學到，倒是挨了不少巴頭和鄉頭。我受不了他家的虐待，傷心地哭着跑回家。那時當學徒要請鋪保，老板就去找介紹人，要叫我父親賠他家三個月的伙食錢。那時我們雖然住在五里多，但是沒有一分田，沒有一塊地，生活十分困難，哪里有錢來賠他的伙食費？後來父親把我罵了一頓，向老板說了很多好話，老板才說：“不還我伙食費也可以，但是有一條，以後不准再學皮匠，如果我知道你再學皮匠，就打斷你的腳杆！”

後來我又改行學裁縫。在這裡，我每天要煮八個人吃

的飯，還要領兩個娃娃。為了學點技術，有時抽空到師傅旁邊站着看看，老板就馬上將娃娃遞過來惡聲惡氣地說：“抱着娃娃外面玩去，站在这里痴呆呆的干什么？”在他家半年多，連縫紉機的邊都不得沾，剪裁更不得學了。我原想學點技術，誰知整天幫他家做雜活，當傭人。我心里想：這樣下去怎么能行啊！一天晚上我趁師傅們都睡下的時候，悄悄地去開機器，拿些碎布來學縫衣服。因為害怕老板發現，心慌手抖，把一根針別斷了。老板聽見機器响，大聲喝問：“是誰？”我不敢答應。他翻身下床，看見我在弄機器，衣衫顧不得穿好就跑過來，劈頭給我幾個耳光，又朝我的胸膛踢了幾腳。他指着我的鼻尖罵道：“你敢亂動我的機器！搞壞了，把你賣了都不夠賠。小雜種，你給我滾！”就因為搞斷了一根縫衣針，我又被老板攆出來了。

為了混碗飯吃，不至於活活餓死，我到岔街一家館子當跑堂。每天從早到晚，就是洗碗、端菜、抹桌子、招呼來客，忙得團團轉，一個月只得一升米的工資。錢多少不說，還要經常挨國民黨反動軍官毒打。有一次，偽保安團的幾個反動軍官來吃飯，錢也不給就走了。老板怕惹他們，叫我去要錢。我就老老實實地跟在他們後面邊跑邊喊：“老总，你們吃了飯還沒有付錢嘛！”其中有個反動軍官說：“好，要錢跟我去拿。”我以為是真的，跟着走了一段路，猛不防他轉過身來踢了我幾腳，當時我就昏倒在地，耳邊隱約

听见：“小杂种，你要钱，老子给你含口钱！”在黑暗的旧社会，穷人走到那里都是挨打受气！这家馆子当街，经常有国民党的反动军官来吃“恶霸饭”，吃了不给钱，还要打你一頓。在这种场合下，狡猾的老板不肯出头，都是叫我们去挨打。我心里想：经常像这样下去，早迟一天会被他们打死，白白替老板送命，太划不着了。我忍耐着干了八个多月，就悄悄地跑回家去了。

前后两三年，我在三个行业当学徒，受尽了折磨，什么技术都没有学到。我体会到要想学点技术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也就打消了学技术的念头。

我走投无路，就去帮本村一个姓陈的地主拉马车。那时交通不便，昆明郊区还没有汽车，每天从昆明拉到小板桥，一天要跑两轉。每天所得的钱要交给地主九成，我只得一成。狡猾的老地主怕我少报，喊他那小儿子坐在车上“押车”。晚上回来吃的是残汤剩饭，要是他家剩饭少，就只得个半飽。要是交给他的钱少了，还要挨打。穿的是从破烂摊上买来的旧衣服，几年还缝不起一件新的。大雪天穿着草鞋拉马车，脚冻僵了只好放在马屁股下面去取暖。晚上睡在马厩楼上，冬天冷得发抖。夏天蚊子多得像“赶街”，实在没有办法，只有将破裤子用来做“蚊帐”，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脚上满是红疙瘩。

那时赶马车不但要挨地主的耳光，还要挨国民党军队

的枪托。在这一路上，經常都会碰到国民党的官兵，要是遇上他們“換防”，那就更倒霉了。有一次，国民党駐巫家坝飞机場的軍隊要“換防”，把我的馬車“封”去給他們运軍火弹药。这天还有許多馬車也被“封”去。从早拉到夜里四点钟，人馬都累得要命，一天沒有吃着一頓飯。回到地主家，他反而說是我哄他，給我一頓毒打，还要我賠那天的工錢。在旧社会，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訴！后来我生了病，几天不能赶馬車，老地主就把我赶了出来。从此，我又失业了。

以后我又进了一个私营厂当学徒。一天要干十几小时的活，經常挨打受罵，每月只有五角的理发錢。辛辛苦苦干一天，晚上就睡在机床旁边。旧社会的学徒，就是老板的散气包。有一次鋼皮尺不見了，他却一口咬定是我偷他的。我沒拿他的东西，打死我也不承认。后来挨了一頓毒打，叫我赶快滾蛋！

昆明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从苦难的深渊中救了出来。1952年我考进了昆明机床厂。进厂后，领导馬上就发給我一件棉衣。从小长这么大，我还没有穿过棉衣，第一次穿上它，感到无限的温暖，心里深深地感謝党的关怀。厂里第一个月給我二十五元，我拿回去，母亲还不相信，說我是从那里整来的。我說：“媽！这是厂里发給我的工資。”母亲激动地說：“过去你跑了多少地方，帮过多少

老板家干活，从来也没有得过这么多钱啊！解放了，真是太好了，今后你要好好的干工作，听领导的话。……”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好工人。在旧社会我没有读书的机会，进厂时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进厂以后，党培养我，关心我，除了在业余学校学习外，还几次调我脱产学习文化。现在我已经有了相当于初中的文化水平了，不仅能看书、看报、看小说，而且还能作简单的笔记了。

党对我的培养是多方面的。不仅在生活上、文化学习上，而更重要的是政治上。我进厂不久，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54年内先后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工作更起劲，方向更明确了。我决心要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我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十六年零五个月的工作量，我做出一点成绩，大家就年年选我为劳动模范。

1956年6月，我第一次出席了全国机械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北京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那天晚上我非常激动，一夜没有睡好。我脑子里想得很多：旧社会我帮资本家干活，挨打受骂，跑了多少地方，学不到一点技术；在新社会我很快就学到技术，自己做了一点点工作，党和人民就给我这么多的荣誉。这些事，过去做梦也没想

到，不好好工作，那能行呀！从北京回来后，我每年每月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1959年，我第二次到北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欢庆大会，晚上和全世界八十七个国家的代表欢聚一堂，共进晚餐。我激动得掉下眼泪。我们工人阶级太幸福了，真正当家作主人了！当我受到奖励的时候，我就用毛主席所说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两句话来告诫自己：不能满足现状，我为党和人民做的工作还太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回忆过去，想想现在，我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像我这个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的穷孩子，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我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我经常这样想：我们青年一代都是党亲手培养起来的，所以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要永远记住旧社会的苦，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只有经常回忆过去才不会忘本。

十几年来虽然自己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工作，但比起党对自己的培养和关心来，就显得太不够了。今后我要加倍努力工作，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永远不忘阶级苦，做一个雷锋式的好工人。

孙显义 整理